# 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

十世班禅：《七万言书》

目录

引子

敬爱圣洁的周恩来总理：敬呈者：总理您为了国内外人民的幸福事业和许多重大国务，虽然很忙，但对卑职视土如金，谬邀眷注，赐恩接见，我表示衷心感谢。

在今天这个难得的良好机会，我摒除私意，从对党的声誉事业和对人民切身利益的赤忱出发，报告一下我们西藏的重大情况，和我通过在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参观访问，以直接间接的各种方式了解到那些辖区内藏族地区的一些甘苦情况中，应向中央报告的部分，以及依据这些情况，在今後工作的方针上应该请求关注的意见，请在宏大的胸怀中稍予关注，作今後工作方针的参考。对不妥不当之处，仍恳以父母诫子之心，严赐批评教导。

在我们河山壮丽、地下宝藏丰富、地上万物咸备圣洁可爱的伟大中华的辽阔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领袖伟大正确英明的毛主席，领导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使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巨浪滔天，对国内外反动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阶级战争，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斗争，终于在 1949 年从中国土地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势力及其走狗----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坏蛋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势力，解放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并于 10 月 1 日光荣地成立了各族人民幸福平等而美满的伟大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根本上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祖国反动统治的最後一幕，掌握了由无产阶级执政的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器，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光辉灿烂的新历史。在伟大的党和革命导师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站立起来，在革命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闻的意志一致，钢铁般紧密纯洁的团结，胜利地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由此逐步改变我国的一切落後面貌，能够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有无敌的力量和不竭之财富、充满幸福光辉、己乐人羡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是肯定了的。

拿我们西藏地区来说，在党和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光辉照样下，1951 年正式得到了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曾经一度脱离祖国而被帝国主义变为半殖民地的目的，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中来。从此西藏人民肯定了要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各民族干部进藏以後，都在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以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掌握下，全心全意地为西藏人民，忘我地办了无数好事，这是我等西藏人民男女老幼都看得见的：主要的是对我们藏人爱若生命的宗教信仰和自己的民族以及民族语文、服饰、好的风俗习惯等予于尊重；同时为了人民身体健康，建立了许多大小医院，进行免费医疗；为了发展农牧业等生产，发放了无息种粮和贷款；救济灾民；建立学校，使人民的许多子弟得到求学的机会，还派许多学生到内地学习，以培养民族干部；修筑了在世界享有盛名的三条公路和区内的公路网，另外还适当地进行了一些工厂等建设。

关于党的统一战线和对上层人士的巨大关怀照顾方面，安排全知佛主(指达赖，在西藏称达赖为“全知佛主”----译注)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我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对以下的上层活佛官员，也在中央和自治区筹委或专区一级等做了同各个人情况相适应的安排，并给了很高的薪资等，对政治地位和生活均给了大的照顾。

在十七条协议中属于中央要执行者，执行无遗，而属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应该执行的如改编藏军等，日复一日地拖延。而且在 1954 年我等来北京之际，中央方面的代表人员和西藏方面的噶厦的代表、堪厅的代表们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以後，经大家同意，国务院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讨论批准要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 1956 年在陈毅副总理和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领导和指导下，在拉萨正式成立；对于这个会议上按照西藏人民的长远的和目前的利益及愿望所通过的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和实验等有意义的决议，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反动分子们也阳奉阴违地进行各种阻挠。因此中央再一次对西藏的那些上层宽容等待，为了给以歧途知悔的时间，发出了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改革，以後改革条件成熟时，要同西藏的负责人士们充分协商後逐步进行改革的指示。中央对西藏工作一贯慎重稳进，对上层关怀照顾、宽容忍让达到仁至义尽，并给予耐心教育帮助，这是我们西藏上层大家心目中所清楚的。

西藏上层反动派对中央给予他们大的忍让、宽容、等待、耐心和优待等加以曲解认为中央软弱可欺，同时由于他们了解到自己的阶级不论迟早终归要从历史舞台上被消灭；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後，少数剥削分子无法继续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进行压迫剥削而过腐朽生活。因此那些人为要剥削阶级永远存在下去而不喜欢革命，从而产生反叛之念，同时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们，预料到我们祖国的整个解放事业，尤其是消灭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剥削阶级，解放广大劳动人民，把最落後黑暗的西藏变为光明进步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地区，其好的影响将是喜马拉雅山也无法阻挡，而必然会吸引受著痛苦的印度人民，使他们觉醒起来，在印度的广大土地上掀起革命浪潮，这将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印度的反动统治者，因此他们积极勾结西藏的反动派，要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以独立之名，行半殖民地之实，依旧是最残酷、黑暗和落後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压迫和剥削西藏的广大劳动人民等，内外反动派为了实现其各种妄想，就打算发动背叛祖国、背叛革命、背叛人民、背叛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武装叛乱。

但若讲出叛乱的真实目的，广大群众和剥削阶级中有不少反帝爱国的中上层人士，他们都会强烈地反对反动派的阴谋，使其无法实现妄想。而由于我们藏族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具有深厚的信仰、热爱、自尊心的、勇敢而勤劳的民族，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实际存在的思想势力，说共产党既然要消灭我们的宗教和民族，那麼我们雪域上吃糌粑、念"玛尼"的全体人们，就要团结一致，拿起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争取独立等散布了许多诱骗人的甜言蜜语，而很多群众和中上层人士由于对实情不睹、不闻和不了解而上了当，这才使得叛乱在我们大部藏族地区成了普遍性的。其始于

康区、次及安多、後来在西藏本区，都逐渐烧起叛乱之火，终于在 59 年 3 月 10 日，不仅在拉萨纠集人民于诺布林卡，由叛乱头子讲：“今天西藏独立了，要从西藏赶走汉人”等，从而公开宣布了反动叛乱，并对拉萨人民进行 18 至 60 岁的当兵动员，纠集外地叛伍，把达赖喇嘛请往印度，而且最後在 19 日晚上在拉萨向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军区等中央各机关和部队发起了疯狂地武装进攻，因此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保障地方的安全、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利益，中央命令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镇压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且鉴于原西藏地方政府背叛祖国，故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将其职权授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向西藏全体僧俗人民揭示叛乱的罪恶，且号召他们参加平叛运动。

同时由于叛乱分子在其实际行动中直接间接地暴露了叛乱并不是为了宗教和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内外反动派的阴谋诡计，所以西藏广大的僧俗人民群众和中上层中思想正直而希望集体幸福的人士，也逐渐认清了这一点，对叛乱头子罪魁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烧起了愤怒的烈火，并且坚决地在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中，贡献了各自所有的力量，从而在党的领导下，由于军民团结一致，协力平叛，因而孤立了叛乱分子，所以在短期内不仅彻底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并且先後平定了山南等地区的叛乱，使内外敌人的阴谋落空，并促使他们向自取灭亡的道路跃进了一步。在西藏高原上彻底消灭封建农奴主阶级等伟大的重要事件，载入了史册。此後，西藏广大劳动人民提出了在西藏迅速进行民主改革，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斩断捆缚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封建制度的枷锁，以求得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

西藏反帝爱国的进步中上层朋友们，在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由于中央在各方面的关怀照顾和思想的帮助教育，所以对自己的出身----剥削阶级的罪恶，有了不同程度的一定的认识，并有了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盼望让他们获得翻身解放，得到新生等一点革命思想的基础。因而在西藏发生叛乱後，中央撤销了一九五六年所颁布的在西藏至一九六二年六年内推迟不进行改革的命令，而打算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际，由于我们爱国进步的中上层人士也都坚决拥护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我和阿沛副主任委员等一九五九年四月来京时，代表西藏人民，向中央首长们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讲了在西藏要迅速进行民主改革的要求，和爱国进步中上层人士也拥护改革，并愿在民主改革中，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的态度。当时中央统战部通过集体和个别谈话方式，对民主改革方面给了指示，并向我们征求这方面的意见。之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您又在特地接见我们时讲了：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并在他们的策划下，发动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叛乱；现在叛乱既已基本平息，西藏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进行民主改革，以摧毁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劳动人民。并指出了这种运动中所要采取的方针、政策、任务、方法、界限和步骤；而且在西藏各寺庙也要进行民主改革，以完全废除封建制度和剥削压迫，消灭叛乱活动，喇嘛要适当减少，凡不愿当喇嘛而愿还俗的，要予还俗成家，从事人和物质的生产；但是对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徒，应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予以保护，并留一定数量的喇嘛在寺庙从事宗教活动；广大僧俗群众的宗教活动可以自由进行等等；在中上层人士方面，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生产资料，予以赎买，并给予政治出路等，一定进行照顾；在过民主改革关方面，除对那些最反动的领主及其代理人、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其它只要赞成拥护民主改革，党可以保护；对中间分子和右派分子要争取等指示。并要我们对西藏改革方法提出意见。因而使我们有机会把所想的坦率地谈了：彻底平定西藏叛乱，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这是正确而必要的，因而真心赞成拥护遵守。已如上述；另外也真实地谈了自己对宗教寺庙等方面所想到的。

返藏後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上根据中央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教导，.先後通过了几项关于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于是在西藏上下南北各地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农业区进行了民主改革的第一步“三反”.“双减'和第二步分配土地；牧业区进行“三反两利”；寺庙内展开了“三反三算”运动。由于发动了群众，使千百年来在三大领主的统治下忍受著各种压迫、剥削所造成的悲惨痛苦的广大农奴和奴隶觉醒起来，有了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他们挖苦根、吐苦水、揭发领主阶级的罪恶等，这场你死我活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浪潮震撼著大地，民主改革的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翻了身的广大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彻底推翻和消灭了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剥削他们用血汗凝成的劳动果实、并使他们失去人身自由等而进行奴役的万恶的

封建农奴制度和三大领主统治的大山；并打碎了套在自己身上的所有封建枷锁，翻了身，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并且成了新社会和土地的主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了劳动人民自己的各级政权，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使过去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变成了具有光辉前途的人民民主的新西藏。这是一件极其伟大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件大喜事。

就以西藏本身来说，它是从旧到新，从黑暗到光明，从痛苦到幸福，从压迫到平等，从贫困到繁荣的转折点，在历史上开始了一个光辉的新时代。西藏走上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祖国其它民族一样，在各方面，繁荣幸福的阳光普照四方，人们都吉祥欢欣、平等幸福、宛如盛茂莲园、甘美无穷、具有妙吉祥的人间天堂----四部具全、无限光辉、人羡己乐的新西藏已肯定要实现了。这样天翻地覆、好坏分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使各个战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但使所有生产力获得了解放，而且广大人民群众以土地和社会主人翁的态度，干劲之树茂盛，在短期内改变西藏贫穷落後的面貌，建设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要求之花怒放，因而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互助组，采取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推广先进经验，改革和革新操作技术等等一系列适当的措施，使西藏连续三年的大丰收的果实硕满。同时西藏的经济、文化、卫生、工业、交通和邮电等事业，也都取得了显著的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西藏工农联盟的基础得到了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领导与人民之间在革命的基础上都建立了新的关系，大家在同一领导下，由同一目标、同一前途的同志式的思想而结成刚铁般团结一致的、任何敌人都无法摧毁的、具有大山一般力量强大的团结；等等。

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西藏发生的变化，取得的胜利和成就，是极其伟大、极其光辉、极其有意义的，是无与伦比或无法抹煞的。在短短的三年中，取得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胜过一切不利因素的巨大胜利和成就使人惊奇，这主要是在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伟大正确、天才智慧的源泉、引导各族人民走向幸福道路的向导、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为西藏所制定的各项正确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坚决地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教导，直接领导掌握西藏的各项工作而取得的巨大成果；同时以汉族为首的全国各兄弟民族、各兄弟省、自治区和市不仅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的广泛帮助，而且在精神上给予很大的支持；也是进藏的各族领导和一般干部、解放军官兵都为党为人民积极努力进行了许多工作而取得的。因此，西藏各界层僧俗人民，对把自己从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痛苦中拯救了出来并置于人民民主幸福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情，永志不忘，并表示著崇高的敬爱拥护；对以汉族为首的全国各民族、进藏人民解放军、进藏各族干部表示热爱敬佩。

由于建成了一座具有革命的、阶级的、政治情感的、新兴的、坚固的无量宫，目前西藏上下南北地区，不论农牧区的城市或村镇或农村，男女老少人民，都把我们伟大光荣的党和向全国人民指引了幸福道路的伟大的毛主席把他们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置于幸福中的恩情，刻骨铭心，赞不绝口。人民自己创作了许多无限感激的颂歌，自己演唱，来表达自己思想上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喜悦心情。同时，他们不仅歌颂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民族团结，以高兴之心情衷心称赞感谢以汉族为首的各兄弟民族人民对西藏解放和革命事业所给予的真诚支援和帮助，以及进藏解放军和干部，为党为人民所作的努力，而且表示今後坚决听党的话，跟著党走，和祖国各族人民携手团结，迅速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的思想等等。整个西藏犹如春临大地，到处呈现出一派圆满吉祥、光辉灿烂的新景象。因此，成绩是主要的。

结合平叛所展开的民主改革运动，是一场规模大、进度快、翻天覆地、轰轰烈烈、你死我活

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因而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是，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不应有的和不利的缺点错误，其中卑职所了解到的一些材料中的原则性情况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严重问题汇报如下：

第一个问题：关于平叛

西藏的叛乱，是具有反对党、祖国、人民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性质的，罪恶很大。因此，党采取平叛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必要的、应该而适当的；而且党还英明正确的指出：平息叛乱，要始终不分割地执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项政策。

中关于对叛乱分子政治争取方面，对一切投降来归的叛乱分子不分叛首叛众，执行“四不”政策，此其一；对被俘的叛乱分子结合对每个人具体情况的深入审查，既有区别而又尽量宽大处理，给予出路，此其二；揭露内外反动派搞叛乱的阴谋诡计，宣布叛乱的罪恶，检查我们工作中有无可资叛乱分子用于造谣的缺点错误，有则坚决纠正改善，　严格掌握今　不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以便通过事实逐步消除一个时期以来曾经上过反动派当的各界层人民群众的怀疑顾虑，此其三；除此之外再无其它。但在执行时

R(1)对放下武器，歧途知悔而投诚的人，没有完全按“四不”政策办事，对许多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逮捕、关押等，遭到大的打击；

(2)在处理被俘的叛伍时，干部采取仇恨、歧视和简单草率的做法，对那些叛伍情况的审查不够全面或不深入，从而也就无法进行合理的区别对待了。

如上所述，由于内外反动派们是打著宗教和民族旗子发动的叛乱，所以叛伍中，有很多是上了反动派当的好人；还有一些人是在上层反动分子的统治权力和武力威胁下，被迫而参加了叛伍的。对前者的大部分和　者的不少人戴上了叛乱分子的帽子而处理了，没有得到宽大；

(3)揭露内外反动分子阴谋诡计和宣布叛乱罪恶方面，本来作的後但由于反动分子用来欺骗人民的主要是说：“为了挽救宗教和民族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使之丝毫不受损後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方面所发生的许多成为敌快亲愁的根源，我将在下面谈。即如此，政治争取就不够完善，致使叛乱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立场顽固、叛乱到底等，给平叛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个问题：关于民主改革

第一：关于农业区的“三反双减”

第二：关於土地分配

第三：关於牧区“三反”“两利”

第四：关於阶级划分

第五：关於发动群众和斗争

第六：关於“七查”

第一，关于农业区的“三反双减”，

在反对叛乱时，宣布叛乱的严重罪恶，对广大劳动人民深刻地进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等阶级教育，激发人民群众反帝爱国，仇恨叛乱分子的情绪，以摧毁叛乱的基础，这是很正确而且必要的。关于对叛乱分子及同叛乱分子有无勾结进行审查方面，各地方发生叛乱的原因、情况和特点，以及参加叛乱的每个人参加叛乱的原因、情况和特点，肯定有各种不同，需要深入调查研究。为此就要充分地发动群众，干部要认真仔细的分析，进行全面处理，就很重要。

但在执行时，把开一两次会和急躁的进行少许学习看成是发动了群众，把积极分子所讲的都信以为真，在运动中只要搞出很多有关叛乱的问题，干部就认为是工作深入细致，以致吹起一阵狂风，从而没有完全执行党关于既不放过一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无罪之人的正确原则，致使未能准确的区分由于思想反动而参加叛乱和受骗参加以及威胁强迫而参加叛乱等三者的界限，有些人在叛乱时住在叛乱地方或者去过叛区，或者只因路过叛区住了一下，就被戴上叛乱分子的帽子。

关于同叛乱分子的联系方面，不分黑白地把在 1957、1958 年同康人和安多人有过新旧往来关系，甚至给路过的康人安多人借过宿的也都算作与叛乱分子有勾结的人；对出于害怕而给过叛乱分子财务的，和被股匪抢劫过的，以及奉原西藏地方政府或者宗奚本、地方上的叛乱领主之命，不得已而支援过叛伍的，也都戴上和自愿支援叛乱者相同的帽子。

还有严重的是对一些人毫无原因的也被干部或积极分子随意捏造罪恶，加上了叛乱分子和反

革命分子的罪名。例如对我和与我一样的知名爱国进步人士，也竟被无中生有的称为反动派，那麽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对于大部分可戴可不戴叛乱帽子的，和不少不应戴帽子的好人，都被冤屈地扣上大帽子，逮捕关狱，没收其占有的财物等，同叛乱罪魁一样处理，致使人们感到惊讶诧异。

反对人身依附，反对乌拉差役制度，进行减租减息，使广大的百万农奴和奴隶从封建农奴制度的一切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从剥削压迫之下站了起来，经济上得到了利益，因此劳动人民非常高兴。但是由于“二八”减租政策在有些地区有兑现与不兑现的各种情况，致使群众中形成了要交租和不要交租之分；不过在这方面除群众内部和领主内部所得利益不大一致外，并没有发生其它大问题。

废本减息方面，领主和领主代理人在 1958 年以前放给劳动人民的债务，本息全部废除，因此，执行时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对 1959 年放的新债，减轻利息而本息都要偿还；劳动人民内部的新旧债务，本著团结的原则，按契约规定办事等等政策，有些地方执行的不够好。

第二，关于土地分配，

对农奴主所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等等，按所有者参叛与否，加以没收和赎买，分配给农业区所有的人，废除了西藏土地的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建立了农民所有制，从而土地所有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对于没收和赎买，是否能使大家心悦诚服感到公正，这完全取决于对参叛与否的调查区别是否正确。在调查是否是叛乱分子和对叛乱有无支援勾结时，要认真彻底的了解，在按实际情况进行处理时若能做到尽量宽大，少戴叛乱帽子，尽可能缩小打击面，争取较多的人，这对于壮大自己，削弱而孤立敌人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正如我方才在前面所说，由于发生了调查不深入、不细致、不符合实情地戴了很多黑帽子，打击面过大等，从而不少不应该没收的家户遭到了没收。因此，使人们对我们产生了怀疑顾虑和失望。

对于赎买，以前我们爱国进步人士的头儿们就表示不需要赎买的意见和态度。这是因为西藏的土地是人民的劳动创造的，不应该归少数人占有。现在归劳动人民所有时，我们接受国家分期付款的赎买，是很不应该的。另一方面，考查原土地所有权的来源，确定主人，这也是一件复杂的事，难以作到准确。这些情况虽已反映，但是党为了照顾反帝爱国的中上层人士和给未参加叛乱的人士以荣誉，仍采取了赎买的政策，对此中上层人士表示巨大的感激和拥护。但是由于只热衷于实行“三光”，而慎重和掌握不够，致在反动文件中把许多土地所有权的执照也焚烧了，因而发生了对真正的所有者是谁、面积大小、有何牵连等无法查对或者难以查对的情况，加之在全区的干部执行的办法也有所不同，因而产生了一些赎买不当的情形，引起领主内部有些意见。但是这毕竟是总人数中的少数，关系不大。

由于在划分阶级时，发生了我在下面将要讲到的把有些农奴列入领主代理人的情况，再加上在西藏也稍微刮了一点“五风”，给中富农奴的土地、生产资料、房屋和余粮带来了一些损失。同时，中、富农奴如果在行动和言论上稍不加检点，就会立即遭到打击，变成人们轻视和侮辱的对象。由于我们对于要团结包括富裕农奴在内的中等农奴做得不够完善致使他们感

到恐惧和忧虑。

第三，关于牧区的"三反"、"两利"

，"三反"工作执行的情况，大体上和前面所说的农业区的情况一样。

关于"两利"，由于牧业生产和牧业经济与农业有较大的不同的特点，为了使牲畜不死亡损失，稳定地发展牧业，党对西藏牧区工作提出在不划阶级、不斗、不分的原则下，实行牧主牧奴两利的政策，一方面使牧奴变为牧工，由牧主付以合理的工资，牧工也要有自求解放，起来作社会主人的思想，好好放牧牲畜，另一方面照顾牧主的合法利益，以发挥他们经营牧业的积极性等，这种比农业区更为缓而宽、慎重、妥善和逐步前进的政策，完全适合西藏牧区的实际情况，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在具体执行中，由于我们的干部一般都是刚在农业区搞完激烈的民改斗争，头脑正在发热，因此一到牧区搞起"三反两利"运动，就对许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展开了激烈、尖锐的斗争，致使许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只考虑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无暇顾及牲畜的管理和繁殖；在发动牧奴的时候，由于只偏重于反对牧主和富裕牧民的教育，对“两利”政策，缺乏应有的教育，因而牧奴虽如数得到了工资，却不听从放牧的指使，且当牧主或富裕牧民稍加数说时，就要受到斗争，等等。由于这样看不到全局，因而对在“两利”基础上达到人安畜旺造成不利因素。

第四，关于划分阶级

党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可以按农奴主阶级和包括奴隶在内的农奴阶级而划分为两大阶级；民改时期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不仅团结包括富裕农奴在内的中等农奴，并且团结农奴主阶级中的左派、中间派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和执迷不悟而又最反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以彻底消灭最黑暗、最残酷的封建农奴主阶级及其制度的政策是正确的。

而由于这个工作干系大而复杂，干部必须抛弃不符合既定政策的一切偏向，对各个人的出身、历史、情况和立场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按实际情况划分阶级，并全面地考虑利害，从长远著眼，尽量宽大处理，除了对必须打击者无遗漏地予以打击外，其余必须严格控制打击面，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到我们方面来，这虽然非常重要，但在执行时，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干部则与此相反，对运动是否细致和质量好怀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不看打击是否准确，而把规模和数量作为主要的，在这种狂风中，把凡是曾经担任过更保(相当于村长的小头人----译注)、措本(相当于乡长的头人----译注)、寺庙执事等的大多数人划为领主或领主代理人。但是如果要问把这些人列入领主和领主代立人是否应该，可以说都列进去是不应该的。关于更保和措本，各地情况不同，有些是有固定的职务和因其职务而得的“食邑”等，这一部分可以算作领主代理人。但有些就不是那样，而是轮流任职的，和由群众自己请求和推选那些合适的人担任的，既无利益还要吃亏，是被官僚毒打等痛苦的承受者，将其列入了领主代理人，这是混淆了阶级的划分?

C 寺庙执事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对中、富农奴的团结好怀，上面我已谈过了。此外关于打击和团结两点，将在下面谈。

第五，关于发动群众和斗争

民主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过去深受痛苦的劳动人民站起来，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封建制度和残酷的统治者农奴主阶级，彻底解放自己，做土地和社会的主人。

因此，其性质只能是：必须使广大群众具有消除一切封建迷梦、清楚地认识封建农奴制度和农奴主阶级的一切罪恶、反对并消灭封建农奴制度和农奴主阶级、进行革命、迫切要求实现光辉幸福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一定的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所以发动群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但是这个工作不是轻而易举的,不仅要使我们的工作做到在应发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头脑中发挥作用,使其中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人民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际上变成行动的力量，而且干部对民改运动要严肃认真地按照党的政策领导和掌握，有计划地控制不发生右倾和左倾的缺点错误，以使民主改革大运动的工作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并全面考虑西藏特有的特点和关键所在，对事情从大处著想，对後果从长远著眼，做法立求准确，尽可能地从各方面防止产生有害无益、敌快亲愁的根源,并努力使发动群众和斗争等一切工作做得更深入、更细致、质量更高，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在实际上，不少地方发生了不利于按照党的政策完成工作而不应当的五大特点。这就是：

(1)召开宣传大会，讲了民改和发动等方面的话和进行学习以後，不看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民改的必要和发动的重要性是否理解，只要能出现一批各式各样的积极分子，就以为群众发动彻底了的特点；

(2)不看积极分子的质量而看数量的特点；

(3)对思想进行强迫命令的特点；

(4)把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思想和行动看成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特点

(5)对意见不审其真假，草率鲁莽地进行各种处理的特点。还有六爱即：爱热闹，爱草率从事，爱奉承，爱找岔子，爱制造麻烦，爱乱打击等。

这里稍谈一下关于五个特点:在发动群众时,虽招集群众作了民改发动等方面的报告或讲话,而群众对意思懂得很少，其原因是：在基层各地没有藏文的民改文件，或者不齐全，抑或有而不完善；口译人员的水平很低；群众的政治知识和文化知识很差；干部对于如何使群众都能理解问题方面不注意、不耐心、不努力或者不够。对学习也大体上和这一样，有勉强和强迫行为，这可以在下面谈。由于这一类原因，多数人对民改问题难以深刻理解。

在另一方面，干部认为发动群众等民改运动只要能搞的迅速，斗争尖锐，轰轰烈烈就算完成了任务；在此暴风式的表面形式之下，最初培养积极分子时，对依靠党的政策的精神：在群众政治觉悟和阶级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培养起一支站在民改运动斗争最前列的真正质量好的积极分子的队伍，注意不够或没有注意。加之干部仅以设法搞出一批不顾利害真假而仅勇于

进行尖锐和恐怖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数量方面可以向别人炫耀为主，乃对群众中有这种指望的人民说："你们在运动中对领主和领主代理人，甚至对有些中、富农奴，也要不分黑白地多找岔子，多提意见，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你们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多没收，才能给你们分到较多的财务等"以经济利益来发动。有些人说没有意见时就给戴上"你是领主的走狗"或"是领主的立场"等各种帽子，施加压力等，由于采取了不要说不服合革命精神，就连世俗公正作风也不符合的各种软硬办法，因而在短期内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仅在数量上不少的积极分子。

由于干部对群众的思想情况没有考虑，群众思想上发动问题虽然没有解决，却以为群众已彻底发动了，就展开了运动。因而西藏积极分子的队伍虽大，但其质量是否纯洁等情况是很复杂的：积极分子本人出身于受苦的劳动人民，过去在旧社会农奴主之下也亲受过各种痛苦，有阶级仇恨，现在英勇正确地站在劳动人民申诉真正甘苦和阶级斗争的前列，而不以包庇坏人、冤屈好人等偏袒行为扰乱人心、不制造缺点错误和麻烦的正确的积极分子，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正直的人民所爱戴的对象。这样的人虽具有一定的数量，但是在积极分子的总数中他们只占百分之几十。大多数则是出身好怀复杂难分，有为了贪图大的经济利益的；有设法按干部的愿望办事，取得亲睐参加基层政权，意图谋个人利益的；有的是设法掩盖自己的罪恶，以混过民改关；有的是敌人代理人为了达到目的，有计划地假装积极分子，等等。由于各种原因也产生了各种积极分子。干部对这些人不仅调查研究不够，并以在短期内得到了数量不少的积极分子，在运动中以大喊大叫热闹而感到满意，认为完成了任务，就骄傲和炫耀起来。例如：到一地方问你们发动群众的怎样?干部除了说发动的好，其理由是积极分子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和运动如何热闹、尖锐以外，至于一般群众对民改运动的认识、敌我界线、革命要求和阶级觉悟如何?以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否忠诚?热爱党和人民的程度如何?工作公正与否?是否颠倒是非制造麻烦?尤其是不是一个真正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赞扬的积极分子等，能够讲出对其质量经过深入地调查和符合实际的分析，且指出优缺点等情况的人是少数的。

由此就可以看出许多问题。党一再教导我们，对于人的思想改造只能教育帮助，不可强迫、勉强、急躁，要作到个人自觉或自动地改造和提高。应该把它当做我们的一项很长期的复杂的重要的任务。这是英明而正确的。

我们西藏民改时大部分地区未能很好地贯彻这个精神，诸如对成年人思想中的宗教信仰等凡是左倾者看不惯和不如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就一齐硬性地利用政权采取强制等软硬兼施的办法，甚至进行斗争，戴黑帽子，以至判了罪等，打算以强制手段在短期内解决思想问题，因而在当时表面上似乎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实际上使很多人思想上产生了怀疑、顾虑、灰心丧气、不满，以致把思想问题进一大步复杂化了。

对于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思想和行动，没有在实际中加以考核，而作为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其一主要在宗教问题上；其二关于不符合实情的冤屈处罚；其三斗争时发生过火。此外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多，下边随时再谈。

概括来说，我们认为：干部或积极分子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一样，无论他的思想和行动怎样，只有能获得百分之七十到九十以上的群众思想上的赞成拥护和支持，才能当做是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如果不是这样而把它当做和算作群众的思想和行动，那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应当的，从而也是无法承认的。

对于揭发作为运动对象的领主及其代理人等罪恶的意见，是否真实，必须认真加以考查，这是重要的。但是抓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说法，把许多并非真实的问题当做真实的，冒然给不少无罪过的人戴上了有严重罪过的帽子，加以打击，这是令人惊讶的，也是所以发生许多打击错了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提意见人所提的意见是否能代表群众或反映群众的思想，要加以考查，而不可把所说的都当做群众的意见，认为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上面第四个特点说明中已谈过了。

关于斗争方面，民改斗争是阶级斗争内容的最重要部分，通过农奴和奴隶进行翻身解放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使劳动人民懂得劳动人民世世代代深受各种惨重痛苦的主要原因，完全是由于封建制度下农奴主进行残酷的强制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并由他们燃起阶级仇恨的怒火，展开斗争，以了结自己痛苦的心病，得到锻炼，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革命热情等，把劳动人民提高一步，消灭农奴主阶级，不仅要使这一阶级内的人们的剥削阶级观点、认识和立场改变成人民的观点、认识和立场，使之成为新人；而且斗争上，对象有别，斗争方法也有差异，即不仅对农奴主阶级和该阶级的人有所区别，而且人中间又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反革命分子和极右分子等区别。

论罪恶也有是否是政治性的区别，并有新与旧、严重程度大小、时间长短、对其提意见的人多少等区别；尤其要看其悔过自新的态度好坏。

方法上结合对其采取保护或争取或者打击的某一种方法，而且是否面对面、规模大小、斗争次数多寡等方面，也按照各个人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并且在对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罪犯的各种真实罪恶的确凿根据，并有群众作证，而不许诬害和在斗争场合毒打等，这些都是党的正确政策。

虽然如此，但实际斗争运动中，完全执行了党的政策的是少的。象我 1959 年下半年以来向中央汇报的那样，没有合理区分阶级和个人，把阶级的严重罪恶列入个人罪恶之内；对于有些需要按照各个人的政治立场而分别加以保护和争取的人，也发生过和对待反革命分子、叛乱分子和执迷不悟的领主以及代理人一样的、难以忍受的、面对面的激烈斗争。

对于由封建制度而产生的强制压迫和剥削，象对待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的罪行一样，并作出诧异的样子。

同时对罪行也没有按新旧加以区别；对能承认错误，能向群众道歉，愿意悔过自新，力求脱胎换骨的人，给以特殊照顾和鼓励等，以促进其上进心，这本来是很重要的，但也作得不完善。

例如以生我者贡保才旦来说，其本人的行为虽无严重过错，但由于曾在封建农奴主阶级中呆过一个时期，一定会有违背群众心意之处；他理解到在群众面前认错道歉和对自己好好改造的重要性，所以当日喀则民改时，无人动员而自动从拉萨去日喀则，那样做了(指认错道歉----译注)。可是在日喀则不要说得到照顾和表扬，反而被工作组的干部唆使中上层人士中的一部分伪装积极分子的坏人、能言会道的、投机分子，对他进行了毒打的面对面斗争。在

西藏类似这种情况不只他一个，象这样不少相信党，同情人民，拥护民改，愿意改造的朋友，

在民改斗争中遭到了打击，从而给他们好心沸腾的热情，泼了灰心丧气的冷水。还有在民改斗争的地方刮起了两大狂风：如果想进行斗争，即如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恣意进行诬陷，以致冤枉了许多好人；而且对于做那些事的人，反予以奖励表扬，而对真假不加调查等，没有进行应有的掌握，此其狂风之一。

本该把斗争对象本人的证据确凿的罪行仔细明确而认真加以对质，以打垮其威风，但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是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是一种专门用于打架的形如钥匙的钢板制的工具----译注)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此其狂风之二。

上述情况不要说有罪过的人，就是中立的中上层人士，和中、富农奴也感到十分惧怕和惊慌，许多无辜的人逃亡国外，有些不能逃跑的，也发生过一些投河或以武器自杀的不幸的坏的情况，从而使正直的人民也产生了怀疑和失望等，所发生的不少成为使仇者满意，亲者灰心，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而增添麻烦根源的缺点错误，在各个地方严重程度大小，性质差别，种类多寡等各不相同。上述“六爱”的情况，因在这个报告的其他许多问题中可以了解到，故不专作解释。

第六，关于“七查”，

对西藏民改进行复查的七项内容完全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工作上获得一些成绩和益处。我们想，复查应该比民改时期更前进一步，对问题应该作到更清楚、更认真、更深入、更细致、质量更高，应彻底发动群众，按照党的政策，不左不右的，准确而使人心悦诚服地、稳妥地处理民主改革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以提高和发挥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干劲，审查干部，处理那些制造麻烦有害无益的分子，以便纯洁和加强我们的干部队伍，巩固民改成绩和胜利，保证各项工作在完善的基础上，不断前进，而不是为了别的。但是作得并不那样完善，如民改的第一个运动，还未结束时，又掀起了第二个运动，由于把第一个运动期间的右倾缺点错误作为主要内容，开展了激烈的检查运动，对于有右倾问题的干部等，给了较重的打击，致使严重的左倾趋向更加发展。因此刚才已讲过的和将要讲的缺点错误情况，在本文每个问题中虽都说到，但其中左倾性质的缺点错误，大部分和绝大部分都是复查中发生的。因此不少人说“复查搞惨了”或者说“没有搞好”，其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个问题：关于农牧业等生产和人民生活

党一贯给予重视，特别在生产上，党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组织互助组，安排生产，克服困难和展开爱国增产进行了动员和教育等；并为了使生产不致衰退，采取了一系列完善的特殊措施，

我们基层的各民族干部大多数都听党的话，领导群众，和群众同住、同商量、同劳动等，对生产起了大的作用。同时由于群众获得翻身解放，成了土地和社会的主人，能以主人翁的思想珍惜自己的利益，在生产上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在生产第一线上起了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老天也没有制造麻烦，我们西藏连续三年获得丰收。

但是其中也发生了不少问题：在想迅速消除西藏的一切落後面貌，并尽快地进入幸福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好心肠支配下，在西藏初步刮了“合作社风”，而西藏的劳动人民当前仅有民主革命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水平低，要求并不那样迫切，从而认为在民改时分得的土地等，不久将不归已有，心情不舒畅，生产情绪下降，生产上不精耕细作，并发生了把先後所得的财产尽情使用的情况；互助组也未完全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有些不愿意参加互助组的，不得不参加，而有些愿意参加的却未能参加；互助组过大；对劳动报酬的分配法也不合理，还由于公积、公用和其他抽调等多了，损害了个体的利益。

同时一部分干部在认为旧的都是落後，新的都是先进的思想和行动之下，对生产糊里糊涂地进行了各种不成熟的指挥，任意行事，主观地搬用经验，强迫劳动时间过长等，做了不少违反实际情况，并使群众情绪下降一类的事。

在我们西藏，由于党给予轻税的照顾，爱国公粮是不重的，但是，在大生产竞赛运动中，因浮夸风而形成了不符合实际的虚报增产，有一些为了掩盖自己的谎言，把虚报的产量指标作为根据，爱国公粮征收後，除群众留了一些种子、口粮、饲料外，其余粮食大部收购了，并且挖了过去的存粮等。由于粮食抓的过紧，使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等，在工作中存在著一些不应有的和不利于发挥群众生产情绪、抓紧生产、发展生产的因素，今天不详谈了。

在边境地区，除了上述外，并在民改和复查时发生的缺点错误的压力和影响下，不要说当地的领主和领主代理人，就连中、富农奴，甚至贫苦农奴和奴隶，同样还有牧民，所有各界层出身的许多人，也感到惊慌恐惧而逃到国外；无人就无法进行生产，这对农牧业生产危害巨大，加之外逃叛匪回窜抢劫多，这是边境的特殊情况。

在牧区，由于牧区的叛乱时间较长，致使牲畜损失大；对从许多牲畜所有权的确定拖延了；“两利”也未能完全执行；加之 1995 年到 1960 年农牧交换中断後，虽然代之由政府供应牧区的口粮，却不足、又不普遍，致使口粮紧张，只得宰吃了许多牲畜。这些都使牧业生产受到影响。

关于城市，西藏的城市虽然人口少、行业少，却在由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而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三者为主；且有不少居民没有固定职业，而以获利大的行业为转移，变来变去，这也显出行业的不稳定性等，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因而一切工作应在认真的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实行一整套有领导、有掌握、有计划、有步骤、有主导、有辅助的方针是重要的。

(1)在手工业方面：除石、木、铁等一批主要手工业外，我们对其它手工业注意不够，使他们在思想上认为自己的手艺在新社会无用，从而转业，也有的失业，致使他们的生活困难，群众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另外有一个阶段，由于对城市或农村或牧区的副业生产，注意不够，缺乏全面的安排等，使生产战线上又出现了有主导而无辅助，不全面、不平衡的现象。

(2)商业方面：西藏许多大商人，有的参加了叛乱，有的外逃了，而我们商业部门的能力有限，又不进口外货等，因而市场上出现了商品比较缺乏，货色不全，必需品供应不足的现象。依照我们宪法精神考虑到为了国家行使主权，公民履行义务，决定在西藏征收工商业税，以保护和鼓励守法的工商业，禁止和限制违法者。

但在执行时，有些地区首先让商人以自报公议的方式登记个人的资金时，干部从各店主所报的有真有假的各种情况中，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些假报者予揭穿这是好的。但是从此干部对所有的商人都不相信了，或人云亦云，或瞎估计，把本来不应计算在资金内的一部分也算了进去，硬说你有这样多的资金。没有这样多资金的人们申诉情况时，就以你脑子有问题一类的话来威胁和施加压力，而当时正值民改斗争，气焰难当之际，因此不得不承认下来。

商业税又系根据资本按百分比征收，因而资金不符合实情的商人们，由于税额负担过大，即使把所有出售商品的利润全部上交也不够，只得抽本金贴补，致使商业亏本无利，不少商人只得请求停业；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一些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商人，因此，物价上涨不稳定，有的剥削很重，给西藏的生产建设和稳定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利因素。

关于群众的生活，平叛民改後，生活逐渐趋于稳定和好转，不但使所有的人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成为人们热爱党、热爱祖国、激发革命热情、提高阶级觉悟、努力生产的主要因素。但是由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一些干部的作风，使一些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困难。

由于农业地区发生了“五风”和对粮食抓的过紧，以及对群众留粮的标准低，因而造成口粮很紧，加之一些群众用粮不当等原因，使不少家户断了口粮。但是以在这方面叫苦者来说，有的是确实断了粮而叫苦，有些是自己稍有余粮而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也叫喊自己断了粮等，各种情况都有。因此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深入认真的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救济断粮户，不使群众挨饿，对有粮户不无故付出公粮这是重要的；但是一部分干部未能作到这样，以个别户的情况设想和概括所有户，致使有的户占了政府的便宜，有的家户是真正断了粮但得不到救济，而由于当时粮食缺乏、紧张，缺粮的人民难从别处弄到粮食，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是拙劣的，严重的。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在西藏 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的自由交换差不多中断了，因此牧民非常缺粮，农民也缺乏肉类、酥油、盐、碱，致使农牧区生活都有困难。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只得吃掉许多牲畜，对发展生产造成不利条件。

民改时，由于禁止来往运送物资粮食等，并对人们在各地往来也严加限制，因而城市需要从农村运来的物资，差不多都中断了，而在城市也收购的余粮多，或者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显得非常小气和拙劣。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口粮、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

由于政府对城市的口粮、青油、酥油未能及时普遍供应，或供应欠妥，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青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著急，叫

苦连天，不安营生，致使城市情况紧张，名实两损。另外，有一个阶段由于全区的家庭纺织停顿，群众在穿著等方面也受到了影响。

第四个问题：关于统一战线

如上所述，党对我们西藏的反帝爱国的中上层人士，始终从团结、关怀和照顾、教育、改造和合作各方面给予很大的保护和爱护，没有什麽不周到之处可说。

我们这些中上层人士，虽在政治上是反帝爱国进步的，但从出身来说，由于来自万恶的封建农奴主阶级，在民改运动中，应该认识本阶级的罪恶，对各自在旧社会里对劳动人民群众所做的极不应当并使之愤恨的事，表示赔罪道歉，悔过自新；赞同和拥护民改，这是肯定要做的。

西藏的改革方面，由于采取了和平改革的方针，对爱国进步的中上层人士，诸如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等，在党的保护下赐予了得以渡过民主改革关的无上恩惠和关怀。但是除了没有要上层中一部分主要或重要人士实际参加面对面的斗争等激烈运动，权当稍微平安地渡过民主改革关以外；其余不少朋友，在民改中遭到了大的困难、恐惧和紧张，因此不符合保护、团结和争取的原则，使人们惊慌意乱，灰心丧气，产生了混日子或者不满心情，从而影响了自己上进之心；在草率从事的做法下，许多好人遭到了打击的总情况，前面已谈过了。

在广大农村中在喜欢乱打击的做法下，对领主、领主代理人和一些富裕农奴，没有合情的区别黑白，而显然以较严厉打击为英雄，不加区别的给以打击；平常也采取各种恶意手段，特别是正式指使劳动人民，根本不许和领主、领主代理人接触；管得极为严格，由此就把领主及其代理人排斥在人群之外，以致他们政治上没出路，生活上困难大，对这个世间无大的向往而出现了悲惨景象，因而难以真正争取和改造好那些人，而可能成为扩大反动派地下基础的条件("地下基础"指隐藏的特务队伍----译者)等，这是没有益处而增添麻烦；对于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扩大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孤立敌人而能使之迅速消灭死亡；保证民主改革；鼓励多数人心情舒畅，信心百倍，干劲充沛地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大踏步前进是不相宜的。诸如此类，由于左倾的缺点错误，在统一战线内起了严重的坏影响

第五个问题：关于民主集中

第一、关於民主

第二、关於集中

民主集中，不但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而且是人民内部一切工作必须遵的一个原则。这是在党的各项政策和国家的各项法规中都一再明确规定了的。

毛主席在谈到关于我国的政治形势时说，要有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详细的说，那就是既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因而，我们的所有路线和政策都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经验而制定和将要制定的。因此，党经常所说的，既然我们过去取得的胜利成就和看到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是来自人民群众，那麼就必须接受群众的意志、愿望和从优缺点的体验中提出的意见，以及对工作的监督等，以便根据群众的希望和实际情况以及发展规律，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谋取福利，这就是能够保证做好我们的所有工作，并使之不断前进的民主。

为了使这个民主既有始有终又能统一起来也要很好的实行集中等的精神，都是特别重要而且绝对正确的。在我们西藏也必须完整的实行民主集中，自不用说了。在实行时，基本上说是够美的了，但是细看一下，也有实行的不全面、不普遍、不完善等不少问题，对此从民主和集中这两方面来谈：

第一、关于民主

在各级负责人和干部中，一部分人，发生了违背民主的行为，对工作的完成和发展，造成了不少不利因素。把党的政策和西藏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工作，这是完成我们的一切事业和任务的根本保证。如果把它只说说而已，在工作中就无法发挥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结合的作用，而一旦脱离了实际情况，这就如同对脚病用头药，不但不利于真正的病症，反而有引起其它病的危险。

西藏的情况是特点很多，而且也很复杂。但是无论任何人，也不能轻易了解的，那就是摒弃骄傲主观和各界层的人民多商量，调查研究，多听取意见，向了解者询问等，力求利用这些办法，以了解西藏的实际情况和西藏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等，要这样作，首先就要到各界层人士和群众中去，对具有左、中、右思想的人们依其各自的观点、看法和认识而提出的先进、中间和落後的意见，不论其受听与否，合意与否，都要以“肚内可容刀枪箭戟”般的宽宏大量的精神，耐心地仔细听取，找到好的和坏的，把正确的精神汇集起来，以使今後党的政策和西藏实际情况以及人民的意志、愿望进一步统一起来，克服和防止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从各个方面发扬优点，不言而喻，这是最最重要的。

但是官僚主义深入下层少，对待意见以是否受听和是否合意而大力偏向，对讲不受听不合意的意见的人，不仅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并且说：“你的脑子有毛病，没有受到教育”等，甚至给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他们心怀恶意或者加以打击，这种情形致使他们处于没有机会提出揭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虽然于事有益却缺乏跃进和积极的味道的意见的境地。

另一方面，那些“要干啊”“要搞啊”之类的话，受到欢迎信任，讲这类话的人得到了进步

分子或积极分子的荣誉关照。因此，虽在各级召开了许多各种不同形式的会议和对集体或个人进行了许多访问并征求意见，但除了大多数人都说：好极啦!美极啦!漂亮极啦!等花言巧语的好听话而外，没有或者很少有人说，不是这样而是那样；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要这样那样的纠正。其原因，就在于我前面所说的那些。

那麽采取开会等办法，商讨工作事业，和收集防恶扬善的意见的意义、好处和效用就缩小了或正在逐渐消失。例如：把一个问题提出商讨，只要到会的人里边，个别人略说一下好的道理之後，就说“再没有意见了吗?”“没有了”，于是大家就举手或鼓掌通过。这固然会有一些人是出自内心同意而举手或者鼓掌。但是也有不少人虽有不满的意见，但由于考虑到不应该因公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就在表面上表示同意的态度，也是多的。

我们的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都只能在大力向群众解释说服而得到群众的同意後，逐渐让他们去做；上级切不可有强迫和命令的行为。但是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把没有得到群众同意欢迎的事情，也强迫他们去作，所以就没有完整地实行民主制度。

第二、关于集中

各级党委会在集中的问题上想来一定会是完善的，详细的就说不上了。而以我们各级政府来说，只是如彼而已。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西藏的最高行政机关，本应行使我国宪法和各项法律、条例中所规定的职权，对自己的直属机关和各级政府进行领导，布置工作并做好掌握工作方法，审查报告，表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等，以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筹委会的任务，这本来很重要；但是各直属机关和各专区，不仅在思想上把筹委会作为是自己的领导机关的认识不够，而且在各自的季度或全年工作报告中，尽说些任务完成得好，工作成绩大之类的话，除基本上和报纸上登出的大半一样外，从来不把重大问题做内部明确的报告，似有内深外浅之分，致使上级不能全面了解下级行政的问题，上下级之间不是那样关系密切和互相信任，加之我们自己也工作经验不够，就难以发挥领导作用。

由于存在著诸如此类的好多不同情况，所以我们行政系统的集中也根本上不能使人满意。

第六个问题：关于专政

第一、关于集训

第二、关于劳动改造等正式关押犯

只对那些执迷不悟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最反动的领主及其代理人实行专政，给予管制

关押等依照国家法律予以惩处，而不冤屈一个无罪的人，这是党的一个政策原则。

但在西藏具体执行中，发生的对可捕可不捕的大部分人，甚至不少无罪的好人，恣意安罪名诬害，列入罪犯之中等，使正直的人民感到惊讶的情况，从我上面已谈了的就可了解，没有必要再说明的了。这里稍微谈一下把被捕了的这些人，进行管制或关狱後或劳改时所发生的那些情况：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第一、关于集训

，在学习党的政策等时，由于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思想，因而，各个人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对那些不太恰当的看法和认识，耐心地进行帮助和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不但没有那样做，而是尖锐的斗争，对有些人还以残忍的虐待进行打击。因此，当人们一听到“来学习”的叫声，心就要悸动，正直的人大都心灰意冷，忧心忡忡，失去了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信心；有的因憎恨而产生了各种邪念；有的只想随机应变的混日子，并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学会了一套口和心之间距离很大的手法，这样就出现了一定数量巧言奉承、舞弄迎合的水平不低的人，以致造成了在实际改造上，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成绩，而内容却完全相反的情况。

第二、关于劳动改造等正式关押犯，

由于关押犯的人数过多，有难于管理的情况，对这些人的思想改造方面，想来不会比集训的好；不仅如此，在关押犯中，除去在西藏军区关押的一部分上层和一般监狱内有少数管理人员能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执行外，其余大部分监狱中对关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其主管这类问题的负责人或管理人员不关心，加之看守员和干部对那些人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抹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对年在五六十岁，体质衰弱，已接近死亡的年老关押犯，也让进行十分苦而重的体力劳动。当我来回走动之际，看到这种痛苦情景时，虽然心中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悲愁，和想“难道不这样不成吗”的怜悯之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总而言之，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曾向我们指示的：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比如叛乱头子拉鲁和罗桑扎西不杀也可以。这不仅是十分正确的、使人感动的英明的伟大想法，而且也是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的。对真正的首恶分子给予关押劳改等，严惩不贷，以儆效尤，而对其余无罪或仅有小罪的人，若能严加控制根本不发生逮捕、关押和判刑的情形，做到铲除坏的，保护好的，就可收到对症下药之效。

但事实与此相反，到处关押著没有好处反而招惹麻烦的犯人，和出现了许多不应当得死罪的犯人的尸体，这会使千百户人家的父母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十分悲伤，眼泪不断这是不用说的；加之不管是否有无罪过和罪过大小，把那样多的人关押起来，并且由于管理不善，致使有很多人非正常死亡。对此，西藏广大人民不仅不欢迎，并且产生了不喜欢、遗憾、惊慌、怀疑、不满，并可怜那些关押犯。

所以这些缺点错误就成了脱离群众的条件，也是逃往国外的叛乱分子和分散在西藏境内的残余叛乱分子对我们更加疑虑、惧怕，不但不前来投降，而且成为反革命到底的思想更趋坚定的主要因素。

同时，西藏的上层关押犯中，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官吏虽被列入叛乱罪魁的行列，但是，大多数是 1959 年在拉萨叛乱时，从 3 月 10 日在罗布林卡叛乱首领宣布反动的口号以後到 19 日之间，在罗布林卡等处招集原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吏开了各种关于叛乱的会议的参加者，其中凡在平叛时被俘的，都笼统草率地算作叛乱首领或罪魁而被关押的。但是，若问这些人是否全是叛乱首领或罪魁?很难说“是。当时召开叛乱会议时叛乱罪魁说:“若来就无话可说，若不来，不问任何人包括家属在内全部杀光”。就如谚语所说“虫不吐油，就要杀头”一样，由于受到所施加的难以忍受的压力，和以特权强制的方式进行严重的威胁，在保全自己的思想支配下，为了解救自己和家属的危险，不得已而听从敌人的摆布，此其一。

在叛乱首领的宗教和民族利益的借口下，对宗教、民族具有深刻的信仰、热爱和自尊心而又不了解实情的好人，上了敌人的当，此其二。

由于西藏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官吏们从祖先时起，受“具喜宫”(原西藏地方政府之名——译注)之恩惠而生存，且自身亦为地方政府之官吏，所以差不多人人都有“在那里吃食就在那里当看门狗”的思想，因而在“具喜宫”的政权处于存亡关头的当时，出于对自己政府的恋念而鲁莽从事，此其三。

这三点在中间人士的思想中具有不能很好解决的性质，故而若仔细考虑中间的人们不去参加一下这些会议就难以呆下去的处境，就可以明白了。那麽可以说当时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党、政、军有关机关都对中上层人士作了争取工作，害怕敌人的人们无论搬到党、政、军任何一处去的话，不是就没有丝毫的危险了吗?固然是那样，可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仅向平时同我们有联系的人作了争取工作，而没有对地方政府的所有僧俗官吏进行。阿沛副主任也积极负责地在地方政府官吏中做了许多说服争取联系，虽起了大的作用，但是也难以广泛等；实际上，我们未能对地方政府的所有僧俗官吏进行说服争取工作，所以把地方政府僧俗官吏中不倾向革命，也不倾向反革命的中间思想的、盲从地参加叛乱会议和叛乱的人以及被强迫、裹胁而不得不参加叛乱会议和叛乱的人们算作叛乱罪魁是不应该的。

可是，凡是被俘的这一类人，在处理时，也不向熟悉这些人情况的爱国进步朋友们了解一下情况就加之以不符合实情的叛乱首领或叛乱罪魁的罪名，进行了关押等之类严厉而重的处罚，对此人们感到我们的法令不公正等等。

关于专政，从我以上陈述的这些当中，可以洞察在西藏实行专政时，产生了把人混淆黑白的许多严重情况。而这种情形看来是利敌害己的。

## 第七个问题：关于宗教

概论

一、关於反对与保护

二、关於宗教寺庙实行民改的情况

三、关於民改後的寺庙情况

四、关於民改后的宗教前途

五、关於民改后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

六、关於信教权利

### 概论

宗教，无论是整个藏族地区，和任何局部，在各阶层人民中除小孩外，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们对其有极高的信仰、热爱和自尊心，故对于宗教的前途，大家极为关心。由于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对其处理的好与坏，对我们能否得到群众的真诚热爱和欢迎，有著利害相关的直接影响。

因此，1959 年 5 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总理您，就有关平叛和民改等西藏的工作方面给我们所作的英明正确的方针、政策、方法和步骤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指示教导中指出，宗教问题方面，中央不仅继续给予僧俗群众以宗教信仰自由，并且保护守法的寺庙和教徒，可以照旧进行“讲辩著”等宗教活动，真是扣人心弦。并指出对西藏寺庙宗教中一个时期曾掺入的玷污宗教和与社会发展不相容的封建农奴制度、压迫剥削制度以及特权进行改革，以纯洁宗教寺庙内部，是重要的；而且以西藏的总人数比例来说，不进行人和物质生产的喇嘛过多，这对藏族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有大的害处，所以喇嘛数字也应精减，使一些喇嘛还俗回乡成家立业，参加人和物质生产也是重要的；寺庙中留一定数量的质量好的喇嘛，从事宗教活动，其生活政府可以予以解决；总之，不论僧俗都可自由信教，并要设法增加从事人和物质的生产者等等。

对此阿沛副主任曾谈过西藏之所以有那样多喇嘛的根本原因和情况，并提出过一些有益的重要意见；我自己也在当时和以後从拉萨写的一项报告中，为了使我们在西藏的革命工作得以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恰如其分而又很有成效地取得大的成绩和胜利，并使人人钦佩而又完全有益于党的声誉，曾“给释伽牟尼教字母”(意思同“孔子门前卖孝经”完全一样——译注)，直言不讳地对平叛和民改等提出了防恶扬善的意见，并特别提出；我赞成拥护在党保证不致损害广大僧俗群众信教权力之下，彻底消灭宗教寺庙内一个时期曾掺入的那些最黑暗

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压迫剥削制度等，与佛教教义不相容，与社会发展不相宜的东西，以好好地改善西藏的宗教和寺庙的旨意；同时表示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藏人，对于在精减喇嘛时，是否能采取恰当地照顾政教两方面的方针，以使人们满意而心情舒畅，改革後专业喇嘛如何生活，是否能够完善地进行纯洁的宗教活动等问题，都是很关心的态度；并且由于藏族人民十分信教爱教，所以明确地划分真正纯洁的宗教和其中混杂的糟粕两者的界线，能使大家不错不混地了解清楚保护何者反对何者，在执行时也同样要严格慎重、仔细踏实、缓慢准确地进行宗教工作是重要的等一些愚见。

我们认为，由于在西藏宗教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应把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信教和不信教两者都有自由等内容，无论在下级和基层中都不偏不倚而端正地予以表里一致的彻底执行；并以法律保障对僧俗群众的合法或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受任何人干涉、阻挠；同时，使从事宗教和寺庙工作的主要人员必须深刻认识到在西藏宗教问题既十分重要，而且情况复杂，对其处理的好、坏，将在群众思想上产生好、坏影响，以便预先防止消除其各自头脑中由于左倾观点以为没有宗教为好等会在未来的运动中具体执行时造成麻烦的一切因素，使干部在思想上既先进又能看到实际，深入全面地进行调查研究、熟悉重要情况後，才让其进行工作、对工作提出意见、领导运动。同时，向许多了解宗教问题的朋友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工作方法等，也是重要的。这样虽然会出现左中右的意见，但应都予耐心听取，集中正确的精华，在工作中加以应用；而且应同忠诚善良的朋友们在工作上合作，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以免事後互相埋怨。

为了工作能抓住关键，并积累丰富的经验，也必须预先进行完善的试验工作，这也就是首先要从领导那里看清此一问题的重要性，坚决地大力加强对此工作的领导、注意和掌握，有计划又有准备，有步骤又稳当，有区别又慎重，既仔细又稳妥，既深入又全面地在西藏各寺庙中，在党的信教自由政策下，把需要保护真正的宗教和需要反对过去一个时期产生的所有封建糟粕的道理进行宣传、学习和发动，提高广大僧尼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认识，并依靠广大喇嘛群众，把要革命也是宗教的纯洁的积极分子放在运动的前列，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压迫剥削制度，反对参加叛乱了的寺院内的叛乱，以彻底干净地消灭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叛乱罪魁——教徒的败类，党和人民及宗教的敌人；彻底消灭一切不符合佛教的深邃教义、不适合革命精神、有碍于社会发展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变过去的封建寺庙为民主寺庙，变过去少数人的统治为“善僧”僧众集体当家作主，把那些在政治上拥护党的领导、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大道，又守法，在宗教方面，没有不符合宗教的行为，“炉小火旺”质量纯洁的善僧僧众留在寺庙，对于所有渊博的宗教学说，通过“讲辩著”、“闻思修”、“智德善”的途径把具有和平利他性质的宗教搞的比过去更好、更深奥，以很好满足广大僧俗群众对宗教生活的需要，做到使之能够说：“党对我们宗教进行了好的整顿，应皈依共产党毛主席”。这是重要的。

对既不能真诚地进行教事又不愿回家的喇嘛，应给予土地等一定的生产资料，让他们一面从事生产劳动，自食其力，以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一面使其参加一定的宗教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喇嘛。

对西藏喇嘛数量过大而要进行精减方面，我们如本著信教自由的原则，提出在寺庙当喇嘛或不当喇嘛的都有自由，留在寺庙内的喇嘛只能依教行事不得有背教之行的条件，那麼，过去因家庭或个人生活当了喇嘛的；或为了摆脱某农奴主的压迫而当了喇嘛的；或因某些小寺庙有派喇嘛差之权而不得已当了喇嘛的；还有搞经商谋利、饮酒等放荡行为者——在西藏的喇

嘛中许多不是为了追求教义而出家，且有与教义不相符合的行为的人，有的会自愿还俗成家，有的势必要还俗成家，参加人或物质的生产；这样，就不仅会做到大大减少西藏喇嘛的数字，增加从事人和物质生产的人，而且使内外敌人没有对党和国家进行诽谤之因，僧俗群众不会有意见等，就会出现一个抑止过错发扬优点的良好局面。

各寺庙的管理组织、纪律、制度，凡是来自过去封建农奴制度的，必须废除，但若没有适当完善的新的去代替，寺内就会有秩序紊乱的危险。因此，关于建立新的方面：关于管理机构，应以要革命也要宗教的积极分子中听党的话，跟著党走、不自私、不主观、重视教事、关心政治、工作上力求不左不右、走群众路线、又有工作能力、时刻关心僧众利益的优良积极分子为骨干，并提出各个方面的能干的人，作为候选人，在党的领导下，由全体僧众满意完善地选举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人和委员。在贯彻有领导有民主的原则下，组成名符其实的民主管理委员会。

关于纪律和制度，因为寺庙和喇嘛是从事宗教的，所以要以佛主释迦牟尼所规定的教律为根本，此其一；又因为喇嘛是国家的公民，所以要遵守宪法和接受各项法律，此其二；再由于一切工作要以人民利益为主，所以要不危留西藏人民的彻底解放和繁荣发展，此其三；要把这三项不予分割而制定出西藏各寺庙的完整的纪律和制度加以实行，

对于住寺喇嘛的生活，对专门从事宗教的善僧们和包括小喇嘛在内的学习浩如烟海的宗教经典的一定数量的喇嘛，为了使他们分内的教事不致发生中断而能得到发展和大的成果起见，由国家负担其生活，予以鼓励，同时对寺庙内的老喇嘛和病患者也负担其生活，对其余喇嘛的生活按我上面所说的，本参加生产，自食其力的原则加以解决，对于以具有历史意义的寺庙为主的西藏的各寺庙和所有大小佛像、佛经、佛塔都要心口一致地好好加以保护，对这些均予很好的执行，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以前就把上述大部分意见和希望用供参考的形式，一再陈述过，已做到了无失无悔。

虽然我和我一样的许多人渴望著西藏宗教问题得到尽善尽美的解决，使藏人们感到心情舒畅，敌人找不到造谣诬蔑的借口；使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者的头脑中对我们伟大的党有好的看法和造成好的印象，从而造成有利于世界无产阶级大革命迅速发展的条件，希望所有这些都能象祥瑞的莲花含笑盛开。但是在实际进行宗教和寺庙的工作时，发生了许多不应当、不妥当、不幸的事情，致使人们感到惊讶失神。关于这一方面在这里稍加叙述：

第一、关于反对和保护

西藏寺庙内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特权和压迫剥削，是过去一个时期由多种原因而逐渐接连地掺入的。这些正如上述，是不符合宗教旨意，不适于社会发展，有害于人民的；因此在民改时加以废除是重要的；对之进行改造时，广大僧俗群众不但没有意见而且会真正欢迎的。因为在西藏近一、二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期间，西藏的一些寺庙的统治者在各级封建政府的支持下，以各种特权对广大僧俗群众进行残酷的压迫和严重的剥削，对群众制造了许多痛苦和仇恨。例如拉萨传大、小昭期间，哲蚌寺传昭的铁棒喇嘛只要稍有岔子可找，就对无辜的人加以逮捕和关押，处于严刑，罚以重金，对有些人强夺其财产权，有些人被打死等等。

由于有这样极端残暴的压迫性，因此在传昭期间，拉萨比较胆小的居民，为了躲避危险就逃到附近的农村去。以剥削来说，毫无根据地征收各种黑税，甚至有狗税、牲畜粪税、水税、

酒税、娱乐税和唱歌税等，进行不可告人的暴敛，如稍有违抗拖欠就被贪而无厌地恣意问罪，因此群众把他们称作“红土匪”，仇恨他们。

另外，寺庙里的各“机苏”(一般指总管寺庙财务的机构及其负责人等——译注)对自己下面的百姓任意加以不堪忍受的压迫和剥削，致使人民抬不起头来，日益陷于贫穷之地；不但抢夺别人的“人根”(指对农奴、奴隶的人身所有权——译注)，而且对民间的任何问题都无端干涉，循私舞弊或贪赃枉法，强行判决，制造了许多麻烦；以化募辖区为借口，在一些地方，从群众那里不是出自信仰的供养，而是强行收取死人的奠仪和征募；此外，还以高利贷和强迫买卖对群众进行极为沉重的压迫和剥削。

同时在寺庙内的等级方面，也不是完全按宗教教义以资历深浅、学问大小执行，而是根据各人的出身，在封建农奴制度中地位的贵贱和有无权势等，在喇嘛中划分高低，上层对下层进行压迫等，有不少诸如此类不合理的制度。因此寺庙内的僧人和在家的俗人对寺庙内的不合理的行径和干这些事的人憎恨和愤火中烧，腹中有长期以来压抑著的许多痛苦要诉说。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懂得：在西藏的各寺庙里，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寺庙都是那样。就是有那些臭气百出之事的寺庙里，干坏事的也只是负责人或执事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和他们的走狗，说所有的喇嘛都是那样，那更是不对的。一般的喇嘛没有那些罪过而且依教行事的“善僧”们更不会那样。关于这一切情况，广大僧俗群众既然知道的清楚，那麽绝没有因此而丝毫动摇过广大僧俗群众对于佛教和依教行事的寺庙和“善僧”们的虔诚信仰。

西藏寺庙中有不少参加了反党、反祖国和反革命的、有千百重罪恶的叛乱，这是有大罪恶的，所以必须相应地严加处理，这是重要的，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参加叛乱的不是所有的寺庙，更不是全体喇嘛，尤其更不可能是纯洁的宗教本身。这是所有正直的人们确实看的清楚的。

叛乱寺庙，也只是从各自的负责人或喇嘛中一部分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罪魁作恶而起。所以为了区别是否参加了叛乱而进行调查时，应该认真细致地弄个水落石出，不混淆和颠倒好坏，做到使所有人民都心悦诚服，这是重要的。

西藏的宗教寺庙问题既很复杂又很重要，因此对反对的部分和保护的都分，就象狼与羊一样，绝对分清，这是重要中的重要。因此如同上述，对西藏的宗教寺庙问题，必须执行既有计划又有准备，有步骤又稳当，有区别又慎重，有细致又妥善，有深入又全面的方针，这是所有上下级都不可缺少的。民改中发动广大僧俗群众挖苦根、吐苦水，揭发三大领主的罪恶时，僧俗群众中一定会有对寺庙和活佛僧众的这种或那种罪行进行控诉，以消自己的疾苦仇恨，这是合理的、必要的、应当的、正确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对寺庙和活佛僧众不管有无根据就危言耸听地加以指责和批评，如能表现出一副大力反对的姿态，那麽就会显著地得到干部的表扬、欢迎和照顾。由于干部中出现过不少公然无忌地以诋毁并反对我们宝贵的宗教和消灭寺庙活佛僧众有好处等道理而直接间接地进行各种动员的人，所以僧俗积极分子中心口不一、随机应变、脱离实际的人一反既往地攻击说：纯洁的宗教本身也是要否定的，不对的。因此，在那些干部的思想上由极端错误的看法而产生了睁眼跳崖的严重的左倾观点。他们认为在西藏既然群众已经放弃了对宗教

本身的信仰而进行反对，那麽反对和消灭宗教的条件已经成熟，以致在西藏的各寺庙内发动“三反三算”运动时，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反对宗教本身，并将其放在了主要地位；对应予保护的圣洁对象，盲目疯狂地进行了激烈的反对，因此在西藏的宗教寺庙问题上，发生使人们魂散神迷，伤心至极以至哀号等不好现象，这是必然的。

第二、关于宗教、寺庙实行民改的情况

发动群众与斗争方式和前面第二个问题第五个内容中所讲的一样，在这里不再重述。现在简略谈一下不属于前述问题，而只是寺庙本身特殊发生的那些情况。

党在寺庙内所持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困喇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消灭叛乱罪魁、反革命分子、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基本上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贫苦喇嘛”这一概念，是不完整的，必须说应该是“遭受痛苦的贫苦喇嘛”因为在西藏的各寺庙内，有一部分由于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主的压迫、剥削和歧视而沦于贫困受苦的喇嘛，对他们我们必须予以同情和帮助，使他们得到彻底的解放，并且在运动中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寺庙内我们也可以依靠他们。但是，也有一些是由于从前有贪酒好赌等坏行为而变穷的，他们是自讨苦吃，无冤可诉，也不是我们同情的对象。但是这些行为放荡的人，只善于投机取巧、甜言奉承和伪装积极，而很难忠心耿耿，所以我们不应该依靠这些人。如予依靠，这些人就会不可一世地给大家造成坏榜样。他们颠倒真假，扰乱人心等，只能制造满屋子的麻烦，难以制造满屋子的好事。这从我前後所已经谈到的和将要说的实际发生的情况中，可以看的清楚。

关于寺庙内的正式民改，既定政策是“三反”，和为了使其完善起见，实行了“三算”。但在具体执行时，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

把这些成为主要任务，而规定中的“三反三算”成为实现此三项的工具或策略，其性质变成了“杀无罪的羊，被杀有罪的狼更威风”。因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的时候，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抓的很紧，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另一方面，问喇嘛们还不还俗，如果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就说“你还没有受到教育，没有破除迷信”而给予粗暴的斗争，甚至被管制或关押者为数也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是铁打的人，就无法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从而使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请求还俗而回到家中，这些人既无法成家，又无力从事生产，加之都不愿离开自已渡过前半生岁月的寺庙，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人之所以只得回家，这就足以证明发生了在寺庙无法居住的严重问题。

在有些寺庙，由于工作队在喇嘛中开列名单，使其回家还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是，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这就使得在我们法律中所规定的男女双方自愿结合，任何人不得干涉，受到法律保障的这一公民权利也难以解释和交代。

在深山禅庵或寺庙中有许多从事终身悟静修禅，严守教行的虔诚教徒，他们视红尘诸事为毒树，悲观厌世；由于革命事业也是红尘之事，所以他们很少有人对之表示欢迎或积极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是可能有的，正常的；但是干部则以为他们有顽固不化的反动思想的基础，

把不少这类教徒予以管制或关押等，对依教行事的圣洁教徒给了严重的打击，加之在僧尼还俗方面，强行采取各种毫无根据的办法，因此西藏的大多数寺庙没有僧尼居住，就是有人居住者也只是人数很少的，且这些人的宗教修养水平也低。

虽然发生了这些情况，而有些人却说："西藏进行了民改，广大僧尼获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权，自愿回家还俗，所以寺庙仅剩下了那麽一点喇嘛"。这种说法，是得不到包括我在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西藏人民思想中承认的。

在消灭佛像、佛经、佛塔方面，从基本上说，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庙外，在西藏的其它寺庙和广大农牧区的村庄或村镇或城市中，我们的汉藏干部中，一部分汉族干部出注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著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由于政府的各收购机关在收购有色金属时，没有考虑仔细区分，收购了用有色金属制作的佛像、佛塔、供器，从而表现出了鼓励消灭那些(指佛像等——译注)的态度等，致使那些寺庙村庄的景象，不仅不象是"有心"之人所为，倒象是"无心"的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而且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话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译注)等而哀号。

把西藏的佛像、佛经、佛塔损坏的如此难以想象、难以形容，对此有些人却说是"广大劳动人民觉悟了而消灭的"，这是丝毫不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胡说八道，因而，也同上述一样，是根本无法承认的。从上述情况可以证实对宗教本身进行了反对。并且由于干部利用政权大力地公然无忌地以许多不同形式对僧俗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恣意干涉，强行禁止，致使僧俗群众意冷心伤，极为不服不满。但是由于对群众严加压制，暂时在一个短时期内被迫无法而不得不在外表上显出宗教信仰稍许淡薄的样子，但这只是硬压出来的。而由于自己信仰、热爱很深的佛教遭到很大的削弱，并不许自己信教，致使许多人思想上宗教情感增长，信仰也比过去更深了。那麽压制人民群众的心愿，违背群众意志，恰好成了孤立自己，造成失败之因。这是违背党所经常指示教诲的要摒弃那些严重脱离群众行为的旨意的。干这些事的人真是眼光短小，心胸狭窄，徒留笑柄。

第三、关于民改後的寺庙情况

(1)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由于大部分寺庙没人居住，所以大经堂等神殿、僧舍无人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沦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

(2)全西藏过去僧尼总数约有十一万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剩余约十万人，民改结束後住寺僧尼权且算作有七千人，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

(3)住寺僧尼的质量方面，除了扎什伦布寺稍好外，其余各寺僧尼的质量一般很低，各自寺庙僧尼中的宗教知识分子和依教行事的"善僧"，大部分如上所述，在民改时由于打击等而

根本难以安居，因此他们不住在寺庙，或者仅有很少一点。事实上寺庙的性质已失去了作为宗教组织的作用和意义。

(4)民改後寺庙的组织方面，随著从过去封建农奴制度而来的那些被消灭，本来很需要既是民主的而又照顾到宗教和政治二者的新的完善的组织，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现在西藏的寺庙中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由寺庙各自管理和领导。但是，若问其好坏如何，则取决于其大多数人员或骨干成员的质量高低；那些人(指民管会成员——译注)是从民改时期的积极分子中产生的，从而取决于民改时期的积极分子质量的好坏，而积极分子质量的好坏，则看民改时的领导者或负责人和干部的教育发动方法的好坏，而这又要看抱什麽样的目的来培养什麽样的积极分子。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寺庙中的积极分子应该是既要革命也要宗教的人。但在具体执行时，与此完全相反，就连是否真正要革命也不细看，只要当时接受干部指使，不看任何利弊而能瞎撞蛮干者，就作为合格的积极分子，因而使喇嘛中不明事理、而以违反教律和恣意行事为乐者；以对别人财物贪婪之心，企图通过斗争以取得大的经济利益者；想以完成工作队或干部的意图而取得青睐之徒，站在了民改斗争的前列。而其中能对和平利他，圣洁至真的佛教进行疯狼般反对之徒，被委为主要的积极分子，使其在工作中起骨干作用，因而我们的宗教和寺庙问题搞的不好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此。

民改结束时，那些人又被列为各自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的候选人，让僧尼群众加以选举，而僧尼群众的觉悟不够高，不敢讲真诚的意见，因而这就不完全体现民主选举的精神。由这样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寺庙和领导喇嘛、处理一切工作等，就只能是敌快亲愁，增添麻烦，而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化乱求益，人羡己乐，有利于党的声誉。这是所有懂得取好舍坏的人们看的清楚的。

因此西藏各寺庙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好的既或有也是个别的，广大僧尼的思想上对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满意而反对的；可以说是些在工作上制造百孔千疮之徒。拿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人来看，基本上可以这样讲，而拿每个人来说，则不妥当，需要进一步仔细分析，今天不谈了。

(5)民改後寺庙的纪律和制度方面，凡称作寺庙或僧尼者，其本行是进行宗教活动；僧尼们在政治上又是个公民，因而如我上述，政治上要同一般公民一样，接受党的统一领导，拥护宪法，反帝爱国等；同样，在宗教上要“皈依三宝”(佛教中把佛、法、僧，称为“三宝”是至高无上的——译注)，遵守佛主释迦牟尼命定的教律，尽力完成佛主训示的弃恶取善之所在，这是不必说的。但是西藏的寺庙在左倾负责人所谓“要破除迷信”的说法下，以极度严重的左倾行为，把佛教的教义入门或根基，区分佛教与外教界限的“皈依”也作为要破除之列，一味鼓励僧尼的违背教律的行为，并强迫而为，逼使其参加抛善作孽的坏事，而且参加了的人可以得到进步分子或积极分子的光荣名位，和特殊照顾等；因此使那些寺庙已经和正在由积善之地变成造孽之所。

(6)民改後寺庙僧尼的作风方面，本来是需要成为不论从宗教政治二者那一方面来看，都是既合法又合理，有规有矩，足以引人入胜的作风，这是丝毫不容置疑争议的。但是，西藏的寺庙中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前述情况之下，除了背道而驰，不可能有其它。那麼就说几件民改後僧尼作风中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姘嫖酗酒

等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并公然无忌地在寺内结恋妇女、宿发改装等等，极为不轨之行，不仅自己作了，并动员僧众们也要那样作，致使其作风颠倒无伦，因此搞得提起现在的喇嘛的作风，人们就摇头发呕。

(7)寺庙任务方面，寺庙和喇嘛的本行的特殊任务是要使宗教的主要活动不致削弱，并对其一般活动也要适当安排不使有失；同时，进行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觉悟程度和懂得敌我界限而有健全的阶级认识。以此二者为根基，除了专行教事和从事劳动有困难者外，其余能劳动的喇嘛，为了有利于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也进行适当的生产，逐步做到自食其力，这是正确的。但是事实上，连在各寺庙中做为衡量有无显宗传授标准的“三根基”也废弃了等，宗教活动少如白天的星星，至于完整的宗教活动则几乎没有了。政治学习也没有达到击中要害而于事由益，把生产列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众和“善僧”都被支配劳动过度，由于那些人过去没有劳动过，而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但生产成果也只如彼而已。我们认为，对寺庙生产应该强调或重视，但寺庙本身的性质并非生产部门，因此不应该列为主要任务；而要以其本行任务为主，划分任务的主次。如不这样，那麼留下寺庙僧众就必然变得毫无必要了。举例来说，机关干部、部队和学生们如果要同农民一样去生产，就无法完成他们自己的本行任务，而行业分工就失去了意义，其道理完全一样。通过方才说的寺庙情况的七条中，就能够洞察民改後西藏的寺庙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第四，关于民改後宗教的前途

关于民改後宗教的前途变成了什麼样子，宇宙间所包罗的一切(事物)都是瞬息万变，趋于消亡的；不变化不消亡而能存在者连一件也没有。因此佛教的存在也有时限，这是我们慈悲之主释迦牟尼已经明确讲过的。但是从我们西藏来说，各界层僧俗人民对佛教有很大的信爱，不仅在群众生活中宗教生活居于不可缺少的地位，而且宗教本身的性质也是和平利他。

在西藏，佛教的传授醒悟有著牢固基础的时候，有意消灭宗教是最不应该的、很严重的、极其拙劣的。例如人老後就死，是普遍规律。若把一个既可爱又需要、体力旺盛的无罪青年故意处死，将会如何呢?与此相同，对于佛教遭受巨大衰败而濒于灭亡的这种情况，我们全体藏人之所以于心不忍，其原因也在于此。从实际情况来说，民改後有喇嘛的寺庙，大部分的例会(指喇嘛照常的集会——译注)、时会和时祭都基本上中断了，集会和辩经没有了，因而显密理论的讲辩、“教经读经”、“传释教诫”、“编著经论”、“灌顶随持”、“悟静修禅”、“画线设坛”、“献供火祭”、“初十礼佛”、“廿五香会”、“还愿供神”、“跳神练音”、“送鬼驱魔”等正常的宗教活动基本上没有了；从而使“讲辩著”和“闻思修”的甘露枯竭。而有宗教学问的人们将逐渐死去，教事陷于停顿，学问失传，愁著新的没有培养，因而使西藏土地上昌隆的传授醒悟的佛教眼看被消灭，这是我和藏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无法容忍的。

第五、关于民改後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

首先我简单谈一下宗教生活在西藏所占的位置。我们藏族信仰佛教约有一千三百年，并因宗教文化十分发达，宗教对藏人的观点、看法和认识影响很深。所以对待一切客观事物的好坏，都是以宗教的观点、看法和认识为转移的。同时不论个人或家庭、或村庄、或部落、或地区、或全区若发生了任何甘苦好坏大小之事，都离不开宗教活动的。

例如：以个人来说对于生老病死、灾难贫困、嫁娶结友、学习求知、谋生生产、开端行事等

所有活动，以及身、口、意发生任何苦乐好坏，都祀奉“三宝”，祈祷其化凶为吉，成就诸愿等，无法和宗教活动分开。从一家到全区也都这样做，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在西藏宗教生活对所有大小问题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生活。”

但是民改後僧俗人民宗教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趋于消灭、中断，而严重至极的情况：要把房顶的经旗拔掉；身上不便佩戴护身符和“金刚结”；家里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也要藏起来；不敢公开念经积善；不敢烧柏香敬菩萨；对圣地和有名的佛像、佛塔等的朝拜供养，转经和供养"善僧"，布施穷人等积德行善之事都不便于或无法进行，形成病不念经，亡不超渡等。比如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後若不进行超渡，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期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死的早一点，还能得到祈祷超渡，现在死就象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仅仅从这悲惨之叹息中，就可知道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况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因此今天如一一详述，时间是不够的，谈一下总的情况就行了。

第六、关于信教权力的情况

关于信教权力的情况，在西藏民改期间及其以後所发生的寺庙的情况和宗教前途的情况以及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况等，以卑职方才在上面已经比较全面的谈了的具有原则性的情况为例，从西藏实际发生的许多事情中可以看出，我在去年一九六一年向总理您曾经报告过的：“西藏过去只有信教的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从民改以来有充分的不信教的自由，没有信教的自由或者仅有一点影子。”这种陈述肯定是和西藏实际发生的情况符合无错的。因此，党允许信教自由的正确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明文规定在我们藏族地区只执行了一半，这是违背党的正确政策和国家的宪法的严重行为。

我们认为：党的政策和国家的宪法只能是全体公民的太阳，不可是偏照一方的太阳。因此所谓信教自由只能是对不信教者给以法律保护，对信教者也给以同样的保护；不信教的人士若以有信教自由法律为借口而来阻碍、危害宗教信仰，就是违法的严重行为。这是世界上一切懂得法律的人士都会理解的。对于信教来说，信教所需要的寺庙、"善僧"、佛像、佛经、佛塔以及一切大、中、小的宗教活动都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消灭这些，就无法搞宗教和信教，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这正如告诉一个人“你好好地吃饭”，但是却拿走他面前的食物，那个人去吃什麼呢，其道理完全一样。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说以西藏为主的所有藏族地区，从民主改革以来，宗教、信教和寺庙问题根本没有搞好的说法、看法和认识是有根据的，而不是恣意找岔子、诬赖诬蔑。因此所有藏人中除了不会思考的小孩子外，其余各阶层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都非常诧异，以至失神，现在只要向藏人一提到佛教，就不由自主的伤心至极而落泪，口中道出痛苦之言等情况非常严重。

因此，今天卑职摒出私念，从党的声誉事业和人民的愿望出发，中肯坦率地陈述了，可是一定会想到照此人所说的来看，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其他许多藏族朋友，都没有这样说过，究竟真假如何，而有所怀疑。这是由于大多数人有明哲保身的思想，以及过去所见闻过的许多经验而难以敢于赤裸裸地谈缺点错误，所以不会有许多赤裸裸地谈缺点错误的朋友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很正常的，毫不稀奇的。可惜的是，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够看的见人的思想在想些什麼的机器，如果有这样的机器，看一看藏族的内心，将会是非常有趣和有意义

的。

第八个问题：关于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个许多大小民族集聚在一起的大国，而且从我们新中国成立起，就废弃了力量大的民族压迫力量小的民族和先进民族歧视落後民族等，而通过平等幸福地的途径，使互相兄弟般团结的、血肉相连的祖国大家庭成为各民族的阶界层人民热爱的圣洁对象，从而消除了和正在消除过去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由于互相压迫、掠夺和歧视而形成的互相怀疑、猜忌、仇恨等许多不幸的问题；建立了和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的民族关系，使民族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划分了从旧到新、从压迫到平等、从仇恨到友好的界线，出现了新的关系和新的团结，从而在祖国中华的广阔土地上为各民族人民高兴、愉快、舒畅、己乐人羡、绚丽多采、百看不厌的百花齐放。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的红旗下，中华各民族的全体人民团结成一座钢山，同心同德、信心百倍地很好地进行著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使自己的祖国得以从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等各方面迅速现代化，高举起党提出的三面伟大红旗，完成了和正在完成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各项伟大事业，并且取得了和正在取得大的胜利和成就。同时以毛泽东思想武裝的、已经站起来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铁拳，对准了以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为首的地球上的反动派们的脑袋，致使他们不敢恣意轻举妄动。

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大团结，不仅在我国内部的各项事业中起了根本性的巨大作用，而且对世界进步和革命事业也起了不可战胜的作用和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团结就是力量，也是一切胜利的保证，这一伟大真理，又一次得到事实证明。而这种新的伟大团结是党和毛主席的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产生的伟大胜利。由于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民族大团结是最最重要的，因而上下各级都要懂得其重要，并要进行相应的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国家的宪法、领袖毛主席的著作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文件中都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团结方面谈得很多。我们认为那些不但都完全正确英明，词义深刻，而且也是我们内外一切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保证。

同时，党经常教导说，为了搞好民族团结，首先要对过去历史上各民族统治阶级造成的大或强的民族压迫掠夺小或弱的民族，而使小或弱的民族增长了民族自尊心和自卫思想，对自己的压迫者和掠夺者产生了大的仇恨，因而互相之间进行过许多战争等；同样由于先进民族对落後民族的歧视、侮辱而积下了心病等各种事情，使各族人民的头脑里有对其它民族怀疑、猜忌和仇恨等对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不应当、不相宜、程度不同的坏影响等，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艰苦努力，通过实际行动逐渐加以消除；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民族的新关系和新团结。这就不仅是民族工作者，也是全体干部不可松懈和忽视的巨大的政治任务；并且需要长期同复杂的困难情况进行斗争，以最後彻底干净地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思想上存在的一切坏印象，逐渐做到各民族成为真正的兄弟。

我们认为这些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也都是关键性的。要搞好民族关系，使各民族达到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合作共享、同甘共苦、同处共权的新的民族团结，这不仅是我们全体民族的任务，而且也是需要大家去热情地完成的一件大喜事。因而各民族以及各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而且必须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但是以对这件事的功绩或能力或成就大小来说，需要主要由大的、强的和先进的民族去作。因为，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好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由于大的或强的先进民族的统治阶级的恶果所产生的各种不合理的行径，而给小的或弱的或落後民族的人们造成了不满，致使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互相怀疑、猜忌和仇恨等不好的因素。因此现在要消除这些的时候，只要首先消除其因，那麼果就自然不会产生，这是普遍规律。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大民族要认真和努力去作。

基本上来说，大民族主义具有进攻的性质，而地方民族主义具有防御的性质。如没有进攻了，防御也就会逐渐消失。这两者之间，有因果性质(指关系----译者注)。在我们西藏流行著一个堪为团结榜样的故事，即“和睦四弟兄”。它描写四个大小动物不是按各自的能力大小，而是按照长幼之分，由小鸟而至兔子、猴子、大象等依次倒排，大动物尊敬和背负著小动物。这也是富有深刻的团结的准则性意义的。这四个动物不以各自的能力自负，而完全是敬老慈幼、或有能力大者爱护小者，所以他们团聚一处，谁也无法使其分离开，过著和平、友爱、温暖的生活，树立了一个人羡己乐的圣洁的历史榜样。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也显然完全和这一样。如果干部在具体工作中，违背这一点，其相应的恶果，将使团结和幸福的生活趋于毁灭，而不会有其它。

我们西藏是一个藏族聚居地区，因而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等在我们工作中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就这方面稍谈一下：

西藏辖属于祖国中华虽然已有好几百年了，但因统治方法和内政治理方法同祖国内地其他少数民族不同，所以各界层大多数人民对藏族的观念强，而对祖国的观念差；想中央会给西藏以大的特别照顾的愿望迫切，情况复杂；同外国接壤的边境线长；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处心积虑地要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他们和逃到国外的西藏反动分子合伙，千方百计地、日以继夜地干了和正在干各种坏事等等，西藏有和祖国内地的其它各民族不同的重大特点。

但是如上所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党、毛主席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掌握下，进藏人民解放军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大多数干部，都根本上抛弃了对藏族和人民的压迫、掠夺和歧视等，全心全意地为西藏人民做了无数好事，充分显示了是人民的好勤务员，从而逐渐消除了西藏人民的怀疑、猜忌等，群众说：这些新汉人和以前的汉人不同，他们对我们藏族真好啊!诸如此类，初步表明西藏人民对汉藏民族关系的看法和认识起著根本的变化。

特别是 1959 年进行平叛、民改以後，民族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民族问题的基本点或总的方面来说是很好的。这就是：战胜了劳动人民的和民族的敌人——叛乱分子；彻底消灭了严重阻碍人类发展的最黑暗、残酷、落後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农奴主阶级；使西藏民族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从三大领主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他们站了起来并且成为社会的主人，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力；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定能得到发

展，从而使西藏地区和西藏民族的全部历史有了一个新的开端。难道会有比这更吉祥、更重大、更好的吗?但是，如果较为详细地谈一谈民族工作中的具体情况的话，民族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

(1)平叛方面，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背叛党、祖国、革命和人民的武装叛乱，是以所谓保护宗教和民族利益而在大部分藏族地区发动起来的，带有普遍性。所以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进行平叛是非常正确的。在实行平叛时，如上所述，对情况要进行深刻的调查，以求做到划分得既细致又认真，这是重要的。但有些干部或有些军官对于党的政策没有很好的了解或者虽有所了解没有很好的执行，发生了以对于藏族中一部分反动分子和叛乱头子的严重罪行的强烈仇恨，来对付藏族，说什麼“藏族是一个被宗教信仰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顽固民族”，不喜欢藏族，恶意地歧视藏族，侵犯民族特点。这些人的想法和看法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凡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不仅一定会对自己的宗教和民族有大的信仰、热爱和自尊心，而且会以牺牲生命来保卫此二者的利益。

(2)在民改、复查时，由于干部当中的左倾分子和积极分子当中不明事理的人们的所作所为，使民族的权力和特点受到了一些损害。把必须受到尊重的藏族的语文、服饰、好的风俗习惯等主要的民族特点，也在所谓革命工作中大破坏、大暴露、大建设的三大之下，认为一切旧的都是落後的、肮脏的和无用的，不区别其实际上需要与否，全部混淆在一起，而刮起要予破坏的风，忽视藏文，嘲笑藏装，并且说什麼“浪费了材料，穿起来不方便”；对妇女的首饰、男人的辫子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致使无法继续穿戴和留下去；对屋墙外的粉刷、屋顶的旗杆、婚丧送礼、庙会敬神、节日娱乐和民间体育等也看做无益多余的，致使大部分停顿了等，诸如此类，难以一一叙述，也没有全讲的必要，不再讲了。对民族文字、服饰、好的风俗习惯等主要民族特点的重要性我可以在下面来谈。

(3)民主生活不健全，对于应受法律保护的各项民族权力，未能依法严格执行，因而干部中有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人，自以为了不起，骄傲自满，刚愎自用，偏爱(自己的)民族，忽视藏族特点，侵犯藏族的权利，甚至给提到藏族权利和利益的人强行扣上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帽子等。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头巧语，随机应变，私利熏心之辈，在大民族主义者面前，逢迎装相。上述这两流不同的人物，结伙在一起，制造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麻烦事，对我们汉藏两族之间血肉般不可分割的良好团结进行著摧残。

以自治权为例，首先必须作到能享用本民族的语文、服饰，这是重要的；但是，西藏自治区筹委的一切公文，只用汉文起草而不用藏文，而我们正副主任和委员中的藏族成员，大都不懂汉文，因而只是把我们需要看的文件译成藏文。具有法令性的决议和布告等，只求在汉文上搞好了，藏文只要能理解意思就行了，至于其好坏极少有人注意。筹委要发给下级专区等的命令、指示、通知，因西藏交通不便，大都先拍电报使其执行，然後渐次送发正式文件，但这些文件很少是汉藏对照的，且西藏连一本藏文电码本也不使用，电报上就更无法使用藏文。呈送到筹委会的报告大部分除了汉文外，很少有藏文，从这里你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基层也很少使用藏文。由于在各级政府中藏文的需要性和作用已降低和正在降低，因而藏文逐渐成了民间的文字。

在各级政府中工作的藏族干部，如果不穿汉装，就难入人之列，看不顺眼，都予嘲弄歧视，因而多数老少藏族干部现在都穿著汉装，他们是否都是甘心接受而穿了汉装的呢?应该说有根据去怀疑。因为：不可能有人不爱本民族的服饰；自己不论多少都有藏装；自古至今都穿

藏装工作和生活。例如老年人说："穿了汉装腰冷，但是现在又不得不穿"。群众把穿著汉装的藏族叫作"假汉人"。由于对自治权的第一项语文和服饰处理的不好，也就是对自治权力做下了不妥之事。

(4)藏族人口方面，解放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人口也在开始发展了，但由于上层反动集团之叛乱，耗损了不少人，其责任应全部由那些反动派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来负。但是，如我上述，在专政中许多关押犯悲惨地遭到无故死亡，其责任则在于我们。总之，几年来，藏族有大的损失，各地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一定的减少，比较严重的地区一看居民就能很清楚理解到只剩下许多妇女和老幼，青壮年和知事通理之人减少了，这对我们藏族自己来说，是个危险的问题。

(5)文化教育和发展文化方面，西藏是个民族自治地方，因而必须主要学藏语文；同时学习汉语文，以便于藏人们能直接从汉文阅读、学习革命理论等许多文件，克服汉藏双方在语文上互不通达的困难，这是重要的。现在西藏各中小学也算那样做著，但是，在中央一直到地方各学校、机关和编译机构中，对我们的藏文自以为是地任意作好坏之分析，以藏文新词汇不够为借口，歪曲地说藏文低级，传意表达能力差，对藏文的荣誉进行侮辱。

藏文中新词汇不够虽是事实，但从来未听到过今後也难看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语文一开始就有丰富足够的词汇。因此大家都应该抛弃对各自语文的骄傲自满，而观察其他语文，吸收其优点，以发展自己的语文，使其健全有力，而能为需要服务，这实属必要。如果抓住词汇不够这一点，对语文本身进行诽谤，是极不应该的，并且这种行为就是对民族本身的侮辱歧视。还有不少人，把自己藏文水平低，而做不到词能达意和通俗精湛，都说成是藏文的缺点，这些人好不知羞耻啊!

西藏解放後，尤其是在 1959 年以来，在党的关注之下，文化教育有巨大发展，摘掉了文盲帽子，以能读写简单书信等类的人比过去成倍地增多了，不仅懂藏文的人大大增加了，而且在群众的文化生活中起著有意义的作用，这当然是值得大家欢欣的吉祥事情。但是，由于藏文教学方法不够完善，使藏文原有的传意表达能力、统一性、通俗精湛的优点衰退而进一大步地繁琐了，因而藏文的优越性在逐渐消失。因为，在藏族各地区面积很大而人口很少的特点下，虽然没有一种通用的口语，方言差异大，彼此难懂，但大家却被一种通用的文字统一了起来，这是因为文字既有统一的正字学，又有通用的书面语之故。如西藏的所有文章，不仅康区、安多、阿里、不丹、锡金、夏孔布(指尼泊尔境内的藏族---译注)、拉达克，甚至蒙古等其他民族中懂得藏文的人都能一致地理解其意义；同样，康区、安多、阿里、不丹、夏孔布、拉达克、蒙古等地区所写的藏文，其他地区懂得藏文的人也能一致地理解其意义，所以藏文是一种具有传意表达能力和统一性的好文字。

但是近年来在对其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字要通用口语化"之下，那些藏文水平低而骄傲如高山或阿谀奉承之徒，对我们藏文祖师吞米所创的作为藏文的根基的"三十颂"和"字性添置"(文法)以及历史上学者所撰正字学、通用的书面语狂言乱语地说："不对"、"不完善"，而随心所欲，自以为是地改革文字，致使通俗精湛的传意表达能力丧失了。而且，中央和西藏还把拉萨市的方言作为藏语通用标准语，把不合乎正字学的口音随意拼写成文字，因此，这些文件，除懂得拉萨市方言的人以外，其他人不能完全地理解。同样，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藏文教师和秘书们，由于把各自的方言当做通用的口语而写进文字，致使讲那种方言的地区以外的人们，不能完全地理解其文意，这样藏文的统一性也就丧失了。

把过去一千多年来成万的学者经过刻苦创造而遗留下来的传意表达能力、统一性和通俗精湛的优点均不低的藏文，竟无故被一些妄自称狮的狐狸之辈任意玩弄，这是极不应该的。由于上述种种使过去藏文的较强的传意表达能力、统一性、通俗精湛的优越性日趋衰退，而认识文字的人在了解词义方面也正在成为文盲。这不仅是藏族的损失，而且也是祖国文化的一个损失。由于现在藏文之情况是：没有应得的政治地位，发展藏文所采取的方法不合理，而这两个原因，使得大多数藏族青年只求粗通藏文，不愿好好进行学习，领导对此也不加注意等，形成了藏文前途上的危险和发展藏族文化中不幸的一个大问题。

(6)所谓民族，人都是一样的，其所以有不同民族，是由各民族的地区，种族、民族文化、语文、服饰、习惯等特点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它也有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前面那些是基础，後面的那些是发展的实质，因此具有特性的民族语言文字、服饰和良好习惯等很重要；一旦民族的语文、服饰、和习惯等主要特点消失了，那麽那个民族也就消失了----即转化为其他民族了。

例如：一个在祖先时代，虽是藏族，但自己不懂藏语藏文，连一点儿藏族的特点也没有，同别民族的人毫无二致的人，虽说是藏族也只徒有其名而已。因此为了民族的存在、发展，第一步不但必须使本民族的语文、服饰和良好习惯等特点存在，而且要使语文等民族的主要特点得到发展，这个民族才能存在和得到发展。反之没有民族语文等特点，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那麽更不会有民族自治之理。

因此在民族工作中，保护民族语文、服饰和良好习惯，发展语文等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但我们西藏负责人中的藏族共同这样认识；而党和国家也把民族工作中民族的文字看的很重要，故专门指定很多专家为以前没有文字的不少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并予发展和正在发展，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上面已谈的各项问题，就是党怎样对于西藏的平叛民改等我们的一切工作各自的目的、必要、好处以及每项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和步骤方面给了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一系列正确的教导；当时西藏各阶层和各界的大多数人民对我们各项工作有那些愿望要求、看法认识、意见和想法；在正式进行平叛和民改等时，完全执行了把党的正确思想与西藏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是那些；干部的行为中发生的违背党的正确思想和西藏实际情况的缺点错误又有那些；这些问题的主要内因是什麽，具体的又是什麽，共同的外因有哪些，各自又怎样；干系大小何在；其性质如何；这些胜利和成就大小如何；这些缺点错误的严重程度如何。

对这一切西藏大部分人民有那些看法、认识和想法；大多数中上层朋友又有那些看法、认识和想法。所有这些情况由于我们是藏族内部，不但可以传言相闻，而且在人民群众和中上层朋友中的不少代表人士同我互谈家常以及通过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也经常在内部向我谈西藏工作而均有所了解。以这两方面的情况，作为基础或材料，根据我的智力比较全面的加以总结，把其中重要的部分随时记在札记本上然後经过长期认真的调查研究，再根据事实加以校正後，这次在书面上把在西藏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各阶层人民大多数的真实想法实事求是地汇报了。

现在我谈一下在西藏一个时期内取得的胜利成就和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二者所占的位置，西藏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胜利成就，是无尚伟大、优异光荣和具有卓越意义的，缺点错误无

论如何也不能和它相比，更无法压倒它。

西藏取得的胜利和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或者还要更低一些。但是缺点错误毕竟是缺点错误，不应当，没好处，招致麻烦等，总是不好的。正如我在上面所述，缺点错误中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平叛结合著具有历史意义的民主改革运动，是规模大而迅速，天翻地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紧张尖锐，轰轰烈烈，所以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可能的，也是必然要发生的。

对于不可避免而发生的缺点错误并没有什麽可奇怪和吃惊的，因此如果说要在这样大的运动中不发生一点缺点错误，那是未加思考而说出的话，如果就要这样，除非停止不搞运动，否则别无任何办法。但是做领导的也好，干部也好，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思想上应该有不让任何缺点错误发生的决心，并要采取预防和防止一切缺点错误的各种有效措施，做到无失无悔。

若认为运动中一部分缺点错误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就放任自流，那是极不应该的，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不论是否可以避免，凡是缺点错误，总是没有什麽值得向别人夸耀的，而且在工作中，总是无益而有害，招引一些不好的东西，只能是被所有人们责骂的对象，绝不会是表扬的对象，这是举世皆知的。这正如任何人都免不了患病，但是对于病，有无办法避免，两种情况都存在，但是在思想上必须先考虑不让任何病传染自己，并且也要采取各种办法，而不应该放任不管。万一得了病，不问其是否可以避免，总无值得夸耀之处，而且由于它对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宝贵生命有危险，必然要积极治疗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那麽在西藏工作中发生的所有缺点错误是否全都是不可避免的呢?不是。我们西藏工作中虽然发生了一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错误，但是这在西藏实际发生的缺点错误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发生的缺点错误中，大部分是由于对缺点错误正视不够，预防和防止的办法不妥善或不完整或是徒有其名而形成的。还有一部分干部在各种思想因素支配下，主观、或逞能，随心所欲地干各种违背党的正确政策，和西藏实际情况的事情、增添麻烦、敌快亲愁、有害无益的行为，制造了不少缺点错误。因此西藏发生的缺点错误可以归纳成不可避免而发生的、由于防止不够而发生的、由于制造和增添麻烦而发生的三种。

第九个问题：六一年後的情况

一、关於平叛

二、关於民主改革

三、关於生产与人民生活

四、关於统一战线

五、关於民主集中

六、关於专政

七、关於宗教

八、关於民族

通过上面我结合著对西藏发生的主要缺点错误的认识，比较全面地详细谈过的这些缺点错误发生的情况和原因，来考虑这些缺点错误属于这三类中的那一类，是容易区分出来的，西藏一个时期发生的缺点错误，其中大部分是在 1959 年下半年和 1960 年发生的。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忠实大胆的很好地执行了由革命的导师、智慧的源泉、正确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和艰辛的道路上考验过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卓越无比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风格，对各级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了口心一致的检查；对别人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对工作提出的有益的意见是真诚欢迎的。

那时在拉萨卑职也得到了无悔无失地向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陈述我们各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提供扬善防恶的意见的机会。在西藏的诸位书记对我所讲的事实都很重视，不但表示欢迎的态度，而且对有些意见立即付诸实行。例如 1960 年，我向周仁山副书记谈过“目前拉萨群众中许多人没有得到口粮证，口粮供应不合理，政府的百货门市部少，商店门口人堆拥挤，等的时间长，群众有困难，不方便，很需要纠正”的情况，此後不久，就纠正了。以此为例，象这样做了的还有不少。

西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要是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知道的，不论严重的或轻微的，都能够大胆地进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的特点和英明的优良作风，不隐瞒、不遮掩、不折不扣地及时明确地汇报给了中央。从而使得中央一方面既看到了西藏工作上的胜利和成绩，一方面又能了解了缺点错误。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了解了我们西藏工作中的好坏两方面以後，立即特派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去西藏纠正在我们西藏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他们二位到达西藏後，立即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对纠正和处理西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工作，进行了日以继夜的巨大努力。因而在短时期内把在西藏上下南北农牧业地区的村庄或城镇或城市等工作中所发生的缺点错误的强烈狂风所造成的和正在造成的扰乱万物的安宁、制造和增添麻烦、利敌害己、毁誉招损、损害党和国家的声誉事业的不幸的正在曼延的情况基本上得到制止。缺点错误也得到了初步纠正。从而使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思想上对于我们一个时期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下级干部干的，并非党中央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所为这一点，逐渐认识和相信了。这种认识和信任也开始发展了。

1960 年九月卑职在首都北京参加了庆祝伟大的新中国建国十一周年典礼以後，由于当时中央各位首长都为繁重的国事而异常忙。于是乘这个空闲时间，我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的部长李维汉、副部长汪锋、刘春、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郭锡兰等，一道去我国南方一些省的一些革命圣地和风景美丽的地方进行参观、访问和学习、休养。利用那个时间，我曾把自己所知道的西藏各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情况，口头上向李维汉部长等人明确地谈过，并互相进行了内部交谈，对工作毫无保留地提了意见，这种有必要而有意义的谈话有好多次。

此後回到北京，在返藏以前，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首长们接见我一次，其後总理您又接见一次。在两次接见中指示：对西藏一个时期工作中发生的一切缺点错误不应该忽视，要坚决彻底明显地加以纠正。并对今後西藏需要执行的工作方针、政策、任务、方法和步骤等作了许多指示，对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也有相同的指示。这些都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情况和正确的。由于这些指示，在今後我们西藏的工作中肯定要发挥卓越无比的作用，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相继地取得巨大的胜利和成绩。这不但使卑职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和热爱比过去大大增长，而且也加强了今後对西藏革命工作贡献出自己所有力量的信心。因此，立即表示赞成拥护中央的一切指示，并要在返藏後，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要以成绩来作汇报，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和困难。

此後在离开北京回到西藏以後，把中央的指示向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作了原则的汇报。并依照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指示，把中央所有指示的问题，专门向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负责干部等重要人员做了传达。因此，一个时期来曾被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狂风所掀起的与人们的脑海不相容的浪涛平静了，心情舒畅、干劲增长、情绪愉快的千朵莲花开放了；从而认识到党和毛主席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是唯一正确的，不仅把我们西藏的革命工作引导到一个光芒万丈的新时期，并且是很好地完成工作的根本保证等，我们汉藏负责干部的认识统一了，从而对西藏一个时期在平叛和民改等运动中，以及在各项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进行认真、深刻的检查，心口一致的坚决纠正和作必要的处理，以及对工作进行的改进、整顿等，在执行中央的指示方面，我们汉藏负责人都是“同舟共济”的思想。从那以後，对中央的指示，由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配合，对前一时期的缺点错误纠正、解决、改进和整顿积极地作了和正在作著。因此，现在把去年一九六一年，实际作了些什麼，有那些结果，有那些问题等方面的情况，原则性的简要说一下：

第一、关于平叛

党对于平叛的原则，提出的要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互不分割、三者相结合的这个政策，过去在具体执行中，以军事打击为主，这一点去年已改变了，使其互相平衡，并由于比较完善地发动了群众，因而挖掉了叛乱分子在群众中的基础，孤立了叛乱分子。

同时为了对叛乱分子进行政治争取，对投诚的叛乱分子不分头目和叛众，一类严格执行了“四不”政策，对于过去在平叛战争中俘虏叛伍内受宗教和民族旗子的蒙骗，而参加的和被强迫裹胁而卷入叛伍的这两类人中的不少一部分，不适当地扣上叛乱罪犯的黑帽子，而严厉处置了的人，进行了比较好的复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对一部分被冤枉了的人进行了纠正。

这种做法不论其是否完整或是否普遍，总是正确的；因而在工作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如：残留在西藏境内的叛伍人数虽少，但由于他们对我们仇恨大，叛乱坚决，固执反抗到底，人少目标小而难于发现，住地不定突然出现，尤其由于同解放军进行过长期战斗，在一定程度上也熟悉军事，因而要想单靠军事打击，在短期内求得解决，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他们一方面看到反革命没有前途，而现在自己在群众中已孤立了；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争取和宽大处理。

懂得这两点以後，去年才有些叛伍骨干前来投诚。由此，不仅表明要把战略和战术结合起来，同时也证明准确的做法更胜于雄师。

第二关于民主改革

(1)在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反对叛乱时，如上所述，工作的细致慎重等不够完善，脱离实际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混淆不清地恣意扣叛乱分子的黑帽子，把人逮捕关押，没收财产等，使人们感到惊讶和奇怪。这种行为使许多人产生了仇恨、不满、灰心等。由于对那些各种不良的严重情况进行了调查，释放了一部分错捕的人，人们很高兴。可是应该释放的没有全部得到释放。

(2)农业、牧业和边境方面，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不仅先後制定了边境地区工作具体政策十条，农业区二十六条，牧业区三十条，而且在各该范围内虽有执行彻底与否之分，总都是执行了的。由于这三项具体政策内容的每一个意图，都有一个发挥作用的专门对象，因而不看其大小，总都起了一定的有益的作用。这就是：逃亡国外的人民群众有不少的回归了，外逃者减少了；西藏上下南北农牧地区的乡村或村镇或城市各阶层的大部分人民，不仅心情舒畅，皆大欢乐，积极参加了以农牧业为主的生产劳动，而且人民说："毛主席虽住在北京，却知道我们藏人的甘苦，和心里想的是什麽。一个期间的那些缺点错误似乎全是下面干部搞的，因为今年对这些进行了纠正、处理和改进。党和毛主席是把我们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并为我们谋幸福的人，真是慈祥的父母。"这些显示著把党和毛主席的恩惠铭记于心，和热爱之情在不断增长。尤其对我们干部和积极分子中违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精神而胡作妄为，脱离群众而为群众痛恨的一部分人，进行了适当的处理，改进整顿了基层政权组织，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不仅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而且是对人民负责的。因而党和政府在群众中有了深刻的好影响和威望。这对群众信任和热爱党和政府起了显著的巨大的作用。

由于对边界、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工作制定和执行了具体政策，因而对缺点错误的纠正、处理、改进、整顿，从基本上来讲，已开始趋于完善。同时在党内各级干部中也进行了整风，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使干部能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各项工作各自的目的、必要和好处，以及每项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和步骤方面党的指示和毛泽东思想，从而为集体谋福利的能力、行为以真理为准则和心口一致，以及艰苦奋斗等革命干部的优良作风，在我们干部中有了增长；各级党和政府的干部队伍的质量有了提高；干部中由于对一个时期的缺点错误认识不够，而认为某些缺点错误搞对了、完成了任务、对革命的事业有所贡献等骄傲自满思想比较小了，开始产生了纠正和杜绝缺点错误的愿望，出现了能够为今後工作中不发生或少发生类似缺点错误或者发生後能迅速发现，便于纠正改进而创造主要条件的局面。

(3)划分阶级方面，对一个时期划的不合理之列的一部分人进行了纠正。并接著对于在执行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不仅要团结包括富裕农奴在内的中等农奴，而且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敌人的阶级路线时不全面的现象，也进行了一定的纠正和改进，对中、富农奴等团结对象的团结工作，不管做的够与否，开始进行了团结；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而且对一度在民改时中富农奴的生产资料以及其它财产，被分被拿等所有不应干而干了的，按照要退赔的决定，也实行了一些。这对于争取较多的人到自己方面，以孤立敌人，得到了一定的好处。

(4)发动群众方面，比过去做的名符其实了，所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敌我界线，阶

级认识，革命热情等提高了。斗争方面，恣意进行斗争的狂风基本说来是平息了；神仙会、和风细雨地使人民能够比较舒畅地进行著学习；对过去斗争错的一部分重要人士，说清楚是错斗了，进行了安慰，他们的情绪恢复了，并消除了不满等，这对思想工作起了有利的巨大作用。

第三、关于农牧业等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在中央根据西藏人民的思想水平等许多实际情况，确定从 1961 年起五年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更不成立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稳定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民的个体经济，让翻了身的劳动人民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以推动他们所有的积极性，要使其在西藏以农牧为主的生产战线上发挥作用的指示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不仅制定了上述的边境、农业地区和牧业地区的三相具体政策，并且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注重并抓紧了生产工作等，加强了各种有效措施，并尽力纠正和防止了一切对发展生产不相宜而有害无益的东西。由于 1961 年的农牧业生产工作比 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为好；互助组经过整顿後自愿两利的原则等较为完善了，所以互助组在生产战线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2)由于对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地进行了纠正，采取了较为准确的做法，因而克服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困难，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对西藏生产建设和稳定人民生活方面贡献了一定的有益的力量，从而使城市的面貌也活跃了。虽然投机倒把等社会上不应有的某些部分也有所增多，但适当地进行了限制。

(3)群众的生活方面，在农业区，征收爱国粮标准，按规定的常年产量计算征收，不超过全区总产量的百分之七；交纳公粮者也不超过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的轻税；凡遭受自然灾害者，均按规定酌情减免；鼓励开荒，实行谁开属谁，五年不交公粮；收购余粮，也不超过除去爱国公粮、种子、一年的标准口粮和饲料後所剩余粮的百分之五十。收购後剩余的粮食都可由自己自愿存放、出卖、换取其他物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在农业区二十六条具体政策中对这些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大多数地区执行的也不错。现在大多数群众手中都有少数余粮。加之 1961 年西藏又获得丰收。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农业区的基本情况是好的。

虽然以我去年在祖国内地时，从西藏得到的情况来看，个别地方由于干部的一些行为可能未按政策执行，不过我想不会有太紧张的情况。对牧民，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制定了牧区三十条具体政策，肯定了所有制，比较名符其实地执行了“两利”的政策，牧主和牧工双方均管理、发展牲畜，牧业生产得到了初步的稳定，出现了逐步发展的局面。对牧民，去年也未正式征收牧业税，加之农牧自由交换，使经济趋于活跃的工作搞的好，去年，恢复了农牧产品自愿交换的传统贸易习惯，农、牧、城市三者的需要互相得到满足。由于稍微进行了一些平衡和调整，因而对改善农、牧、城市广大群众的生活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

对城市居民的口粮和油料政府按定量标准做了稳定的供应，且农牧乡村也有一定数量的人来城市出售食品用品，这两方面使得城市中生活方面恐慌叫苦，不安营生的那种情景从基本上说来是消除了。总之，现在西藏上下南北不论农牧乡村或村镇或城市广大群众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适当的解决，生活稳定了，并且开始逐渐趋于好转，人们都开始心情舒畅，兴高采烈，安于营生，努力生产，提高了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等等，这些都正在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声誉和事业。

第四、关于统一战线

如我已谈了的，党以极大的关注；要对西藏反帝爱国的中上层人士，心口一致地坚持进行团结、关怀和照顾，教育、改造和合作，团结和争取较多的人在党的周围，以扩大而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孤立敌人，使之走上死路；使大多数人能够心情舒畅、信心百倍、干净充沛地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

但在民改中，由于一些干部造成的後果，对中上层朋友等不少争取对象，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尤其严格管制领主和代理人及其家属，根本不许同劳动人民接触，把他们排黜于人群之外，使之十分困难、恐怖、紧张，而没有搞好保护、团结和争取等，致使人们诧异惶惑，灰心丧气，苟且度日，产生不满情绪，实际上难以争取和改造好那些人，造成了我们统战工作中不应当、不好、不相宜的那些东西，去年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深切关怀下，对过去一个时期遭到打击的一部分重要的上层朋友，不论其程度如何，都进行了安慰，而且对过去在政治、生活上没有得到安排的上层朋友，大都根据各自前後的实际情况，适当安排，在政治上也给了出路，并放宽了同劳动人民接触的禁令，因而，目前大多数上层朋友才被列入人群，逐渐消除了一度失望等情绪，安心地信任党，努力改造自己等基本情况是向好的方面变化，这种变化在逐渐发展著。同时，也允许在广大农牧区和农村的中层人士----领主及其代理人与人民接近，总之，各方面都稍有好转。但是，从根本上讲，仍然因为基层干部继续进行著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虐待，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应有的前途，生活和生产上仍有困难而悲惨凄楚的那种情景还没有明显的大变化。

第五、关于民主集中

对那种过去一个时期在实行民主集中制中不够全面、不够普遍、不够完善等情况，从去年开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很大的努力进行了纠正，现在仍在继续纠正中。但是人们就象俗语说的：“曾见被花蛇伤命者，今见花绳不相信”一样，要民主生活迅速做到舒畅、活跃是比较困难的，不过，现在比过去好了一些；政府的集中也稍有好转。

第六、关于专政

由于一个时期捕人关押时，未很好执行党的正确政策，逮捕了很多不应该逮捕的无罪或罪过轻微的人，而对犯人的管理根本不周到，致许多不应得死罪的人遭到非正常死亡，从而对铲除坏的、保护好的两者的界限划分不清，致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不喜欢、遗憾、惊慌、怀疑、不满的情况，这对党和国家的声誉事业二者都有害。所以关于这方面，去年卑职曾向西藏工作委员会提出过意见，其他朋友似乎也提过同样意见。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本身，也从大处著想，要尽快地甄别关押犯人，进行准确处理，释放不少关押犯，使其参加生产；对剩下的关押犯，也改善管理，迅速扭转过去那样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所以对捕人过多的某些地方发出停止捕人的通知，并撤销了原来基层可以直接捕人的权力，决定今後捕人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并要向上级提出有关经过情形的详细报告；同时给西藏工委社会部等有关单位发出了要对已捕关押犯进行审查的指示。但是，由于这些机关一般来说工作多尤其是起初捕人时，未很好地区别黑白，冒冒失失，对不少关押犯有那些有根据的罪行都说不上，关押犯人数又特别多，所以短期内很难进行彻底审查，因此对关押犯的

甄别、释放、改善管理未能迅速而准确的执行。但是，由于在各位书记对此工作的关怀下，下级也积极地做了，所以从 1961 年的下半年起，对于一个时期无故而遭到非正常死亡剩下来的关押犯的释放工作已开始了。

去年 9 月，西藏工作委员会社会部副部长智泽民曾给我们筹委正副主任专门作了关押犯工作的简要汇报，在今後的工作意见中说：释放结束後，全区监狱还将继续留有一万名左右的关押犯。我们认为对罪大恶极者进行关押等严惩不贷，以儆效尤，这是重要的；而在只有一百二十万人的西藏，关押约一万名犯人那就太多了。但是，前些时候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说，近来释放了一大批关押犯。如果能在关押犯问题上宽大为怀，给以妥善的宽大处理，这不仅有利于西藏内部，而且对外逃的叛伍也会发生有效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件大吉大利的好事情。

总之，去年虽然仅释放了一定的人，但也有利于使群众认识到过去逮捕那样多的人，是由于干部的糊涂，从而逐渐消除过去产生的惊慌、失望等。从获释的那些人来看，因为见到了各自的家属，全家团圆了，所以心情十分愉快，他们大部分人表示今後愿意遵守国法，好好生产。但仍仇恨我们，心毒手辣的人估计是会有的，但毕竟是为数极少的。

第七、关于宗教

过去民改期间宗教工作中，在区别反对对象和保护对象方面，曾一度发生令人惊异的恣意混淆界线、狼羊倒置的现象；寺庙中民改的做法发生了违反政策的行为；民改後所形成的不堪告人的寺庙情况；民改後宗教前途陷入严重境地；民改後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基本上没有了；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中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力，或成偏面，或者徒具虚名等，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在去年中央听到後提出：这些是左倾错误，要坚决纠正的指示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负责作了一部分纠正、处理和改进的工作

(1)反对圣洁的宗教本身，毁灭佛像、佛经、佛塔和千方百计地逼令僧尼还俗等三方面是普遍性的，并且差不多公然无忌地进行的那种情况，稍有好转，已经不是普遍和公开的了。

(2)民改後整个西藏地区只有七十多个寺庙，为了适应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大体满足群众的需要，把民改期间被搞得衰败破落了的寺庙中的一部分，恢复了寺庙的形状。

(3)宗教前途方面，拉萨举行了“传召”，在那里搞了讲经辩经、和几个格西取得了“拉然把”学位，扎什伦布寺的宗教活动比较完善。因而，说宗教前途比西藏民改期间稍有好转，可以说没有矛盾。

(4)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方面，由于拉萨和日喀则地区的干部停止了对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公开干涉和阻挠，所以群众便于比较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但是其他地区仍然不便自由进行。例如：阿沛副主任和我去年 9 月去山南专区视察工作时，我们看到和听到僧俗群众虽然渴望宗教信仰和进行宗教活动，但是由于干部的暗中干涉和阻挠根本没有方便可言。其他地区除程度有所不同外，估计情况大体上是与此相类似的。

(5)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宗旨，在整个藏族地区都是被片面的执行了的那种情况，因西藏初步作了一点纠正，广大僧俗群众极其热

烈的欢迎和拥护，但是现在当不当喇嘛仍然没有自由：西藏寺庙中有两千多喇嘛正在要求回家，却不让回去；又如民改时被迫回了家的喇嘛当中，未破戒的一万多人，正在要求回寺当喇嘛，又不让回寺；故而过去没有当过喇嘛的人，现在新当喇嘛，不言而喻是无法办到的。故我要声明，需要解决的宗教问题中，现在已经纠正的仅是一部分。

总之，对 1959、1960 两年中，西藏在宗教工作上发生的严重缺点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1961 年西藏工作委员会虽已负责做了如上所述等一部分的纠正，但是只作那样一点纠正是否就够了呢?根本不够。而且我们看来，由于我们干部中那些有左倾思想的人，他们头脑中那种认为厌恶宗教是搞对了，能干、有成绩的骄傲自满思想，至今未纠正好，所以对宗教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纠正、处理和改进根本无法做好，更谈不上取得成绩。因此举一个具体问题来说：在西藏建立专门研究宗教经典的工作没有任何显著的成绩。

由于西藏的宗教前途处于严重关头，因而未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宗教生活的需要，所以群众对我们不高兴，不满意。尤其是这种情况已传扬到外国，正在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诬蔑、中伤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好武器，这在国内外，对党和国家的声誉事业，各方面都没有好处，招惹麻烦，不应该，不相宜的。所以卑职从不无小补的愿望出发，曾向中央建议：为了不使西藏各教派的深奥宗教文化衰败，请求国家赐拨一定的经费，组织专门研习宗教学问的数千个专业"善僧"则感恩不浅。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在西藏搞那麽一批专门研究经典的人是必要的，可以搞。总理您也指示说，毛主席批准的要在西藏搞专门研究经典的那件事，要当做你们的任务把它搞好，以後要作出成绩等。对此卑职以极其兴奋愉快的心情表示感激。并向总理提出，要搞专门研究经典之事，西藏自治区筹委宗教事务委员会等处有的好象积极的人们要反对，那我就无法完成，请总理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自己负责，由统战部负责具体工作。总理您又指示说，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筹委会均有此责任。

关于组织学经专业人员之事，去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三十八次常务扩大会议上专门作出了决议，交筹委宗教事务委员会和中共西藏工委统战部负责办理，後来曾数次去通知催促筹委宗教事务委员会，但工委统战部和筹委宗教事务委员会只是日复一日地拖延，未积极进行。因而去年九月我等来京前夕，筹委宗教事务委员会向筹委正副主任汇报宗教事务委员会总的工作，特别是为在西藏组织学经专业人员做了那些准备，做了敷衍充数的报告，对此当时逼使我无可奈何地向他们说，"在宗教问题上特别是在建立学经专业班方面，你们不仅工作责任心不够，而且也拿不出任何明显的成绩，这就显示了你们对自己担负的工作的失职”等，不得已而进行了一些严厉的批评。

虽然当时他们面红耳赤，而我这样说是为了搞好工作，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当时周仁山副书记说：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内一定要把学经专业班的架子搭起来。他的话真使人兴奋，因为他是书记，说了的事是可以执行兑现的。拿我来说，本来也是筹委的代理主任，但对筹委会作出决议的这类事情提出意见，要下面的机构和人听从和办理却是难的。但是在扎什伦布寺试办了一个不足二百人的学经专业班，这是我利用自己是该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代理主任的名位所得的一点职权，闭著眼睛硬建立起来的。对此没有遇到制造大障碍的人，但也不是绝对没有过。这样看来西藏的宗教工作中仍然存在著不当不良的干系。

第八、关于民族

西藏的民族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民族问题的基本点或总的方面来说，虽然很好，但要详细谈一下民族工作具体的各个方面时，却有缺点错误的。对这一情况，一九六一年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重视、关怀和积极努力下，民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得到不少纠正：

(1)在我们的各级干部和军官中有些人在仇视藏族中的反动分子和叛乱分子的同时，说我们藏族是个被宗教和民族的信仰、热爱和自尊心陶醉了的顽固不化的一个民族，不喜欢藏族，对藏族持有恶意和歧视等，对这类情况似乎有一定纠正。

(2)由于要革命就要进行“三大”(指大破坏、大暴露、大建设——译注)，而刮起了对凡是旧东西不管它实际上有无需要，都予混淆而一概加以破坏的狂风，在政权的支持下，刮的更公开猛烈的情况，现已稍有了逐渐停息的迹象；因此干部对藏装等具有民族特点的东西歧视、嘲弄比过去有所减少，各界层人民极其高兴，广大的农牧村庄中，妇女们一度摘掉的首饰又重新戴上了，剃了辫子的男子又逐渐地蓄起发来，穿汉装的人中间一些人又换上了藏装，粉饰屋墙，屋顶挂幡等部分地敢于逐渐按民族风习做了。因此看来民族服饰，风俗习惯已有了一点前途。

(3)文化教育方面：进藏的汉族干部遵照中央指示已掀起藏语文学习的高潮。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也算以教藏文为主，但劲头不够，教学方法也不好，大致和以前一样。总而言之，因为西藏的民族工作 1961 年比前一个时期有了好转，所以各阶层的人民都很高兴。而且由于西藏是个民族自治地方，已趋于名符其实的民族自治，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致使敌人逐渐找不到造谣中伤的地方等，这样在国内外已经和正在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声誉事业。

以上卑职用了数万言写的这个报告，是汇报了我们西藏工作中的伟大胜利和成绩的主要情况。同时，党一再地教导我们：要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如实地报告，这样对已发生的缺点错误，进行纠正、处理、改进、整顿，以及使今後的工作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或者使之尽量减少，产生了也能够迅速发现而便于纠正、改进；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一切工作能够完成的好，继续前进。我自己也时时刻刻地关心著党和国家的声誉事业。

我们的党和祖国的声望已经传遍全世界，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我们党和国家原有的骨干作用，能够做的比过去更加良好有力、巩固和广泛，我认为这一点无论对于国内国外，现在和将来，都是重要的。要这样，就必须健全我们的内政，取得一个接一个的又大、又好、又多、又伟大、又光辉的胜利和成就，是重要的。为此，必须对我们工作中的所有的缺点错误逐渐一一克服和防止，并且逐渐加以根除是最最重要的了。要克服缺点错误，首先必须了解它们，认识它们。由于卑职对西藏工作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将我们西藏工作中和各阶层人民直接有关的八大问题中发生了那些缺点错误，以及 1961 年对此已经做了那些纠正、处理、改进、整顿，作了比较全面的汇报。

第十个问题：自治区以外的西藏地区

第一、关於 民族

第二、关於宗教

第三、关於群众生活

在祖国大家庭中，藏族地区除了西藏外，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境内尚有一部分藏族地区和不少藏族。由于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宗教，所以相互情感十分融洽，十分关心彼此之间的甘苦。哪一个的幸福美满增长了，就象自己的幸福美满增长一样，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同样，哪个遭到不幸、有了困难，就象自己遭到不幸、有了困难一样，感到十分忧闷和焦虑。我们藏族各个地区工作的好坏，会在相互间直接引起深刻而有震荡作用的好坏影响。所以其他兄弟藏族地区工作中取得的任何大小胜利和成绩，就等于是我们西藏本身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其他兄弟藏族地区由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同样也等于我们西藏本身由于缺点错误而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既然如此，我之所以一贯非常注意和关心兄弟四省的兄弟藏族地区的甘苦，不仅是出于对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宗教的兄弟人民的热爱，而且特别由于象我方才谈的那样，其他兄弟藏族地区的情况，在我们西藏的工作中有重大干系，所以在这次报告西藏情况时，连同兄弟四省的兄弟藏族地区工作中的主要的或原则性的一部分缺点错误和为了今後工作中扬善防恶、补缺纠正而提的一些意见一并报告中央。

这样作绝不是我干涉兄弟省的内政。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对全国的大中小工作，每个公民都可以关心，都必须关心，并且有按照各自的知识能力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为了扬善防恶和补缺纠正而提出意见的义务和权力。据此，今天在这里把我所知道的其他藏族地区的甘苦情况和所想到的一些工作意见做直言不讳的报告。

全国各个兄弟省、市、自治区解放後十二年特别是最近的四年中，在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下，全国各民族全体人民获得解放而站了起来，打垮了内外敌人。在胜利地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不但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而且圆满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实际情况两者的精华正确地结合起来，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光辉的红旗，党把它们交给全国人民，人民对党更加百倍信赖，人民一心一意地拥护这三面红旗，在短时期内三面红旗形成了全国性、人民群众性的力量，人民以冲天的干劲，为把我国从各个方面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的、人羡己乐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百倍增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一日千里迅速发展的大跃进运动搞的轰轰烈烈，日以继夜，因而就使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主要部分提前两年圆满完成。这样，在过去几年中全国人民高举著党的三面红旗，在我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等大部

分建设战线上取得了世界上空前伟大的胜利和成绩，这些胜利和成绩不但自己方面大家都清楚，就是帝国主义者们也是不得不承认的。这一点别说爱国公民，而且对全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也是一件值得欢欣鼓舞的大事，在历史上富有光辉意义。当然，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四省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取得了胜利和成绩，与此同时由于各项工作的发展速度很高，所以也曾发生过一些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缺点错误。对于那些好坏两方面的情况，中央曾经先後通过长期的直接间接的认真调查研究而了解到的各类问题，是全面而完整、深刻而扼要等，犹如汪洋大海，而卑职所知道的却象井中之水，因而对各兄弟省的总的工作提出意见是没有勇气的，所以什麽也不谈了。

对那些省份的藏族地区工作情况我过去以直接间接的各种办法多少知道一些，特别是这次逗留祖国内地半年多期间，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春二人，对我原则性的谈过西北各藏族地区的工作情况和发生过哪些缺点错误，此其一；

此後当我未去青海参观前，在北京的青海餐厅里，中共青海省委员会的各位书记特邀我等吃家常饭时，王昭书记专门对我简要而原则地介绍了青海从 1958 年发生叛乱以来，藏族地区的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两方面所发生过的严重的缺点错误，此其二；

到青海後，青海省人民委员会省长袁仁远把从 1958 年至今青海省工作中取得的总的胜利和成就、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尤其是民族和宗教工作中发生的左倾缺点错误的情况向我们作了比较全面地内部介绍，此其三；

之後，亲自到青海的几个地区调查参观，听取了各地党政负责人简单的工作汇报，同时为了进一步深入调查，通过群众路线，召集了基层干部和各界层人民群众的代表人物，举行座谈会，想听取群众有那些甘苦呼声和要求愿望以及对工作的意见等，但是，由于一个时期这些地区大体上根本没有民主生活，对稍讲不如干部心意的意见之人，立即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严厉打击，因而人们学精灵了，在公开的会议上讲话的人非常少。我们向群众介绍了党的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政策，不但对他们讲清:“你们应该相信党的政策 "的道理，而且由当地负责人也代表地方的党和政府向群众很好地讲了保证要坚决地表里一致地执行党的“三不 " 政策，叫群众不要顾虑等。之後，我又向群众说明 :你们提意见不必有什麽顾虑和恐惧，现在党制定了“三不 " 政策，不会有人打击你们，我还可以好好嘱托中共青海省委员会，大家不必担心。这样才使座谈会活跃了起来，当时以基层干部为主的群众代表，对一个时期所产生的广大群众不堪忍受的痛苦、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以及今後的要求和愿望等，坦率地、不加粉饰地讲了不少，此其四；

在四川经请求中共中央西南局应允，在成都由中央西南局书记之一廖志高主持，中共四川省委员会书记之一桑吉悦希特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四川省藏族地区的情况和工作情况。之後，在云南，我向桑吉悦希等提出了几个疑问，对此，虽作了很多答复，但未能接触怀疑，可是却了解了不少问题，此其五；另外，不论西藏人、西康人、安多人，由于我们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宗教，所以彼此的真实甘苦情况犹如一句民间谚语说的那样：“藏水有器，藏言无器 "，故可传言相闻。

由于我在藏族中是一个有名望的人，藏族大多对我寄于一定的希望，只要有讲述甘苦情况的良好机会或方便，就必然能讲出思想深处的话，因此通过这些特殊条件，听到了许多重要的话，此其六；把这些相互作了一番认真思考，这次打算就三个重要问题，进一步作言简

意赅的汇报：兄弟省的藏族地区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虽然各地严重程度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讲，除去在我们西藏发生的缺点错误中西藏本身的特殊的几点外，其余不仅全部都有，而且比西藏的时间更长、更严重、更左倾。因而，现在在这些多数地区、男女老幼人民群众，一碰到象我这样藏族中的头儿们，就情不自禁地讲述内心的疾苦，出现眼中流泪的悲惨景象。从这里，凡是明智之人都可看出情况是如何严重。

第十一个问题、关于民族

一、关於平叛

二、关於专政

三、关於民族权利

如我在上面的西藏的第八个问题所述，自新中国成立後，藏族地区，在党和毛主席、国务院的正确英明领导下，在党的伟大的民族政策和伟大的信教自由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各地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和掌握下，各级大多数党政干部，抛弃对藏族人民的压迫、掠夺、歧视等，全心全意地为藏族人民办了无数好事，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人民的好勤务员。

在发展藏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时，各省、市、自治区和以汉族为主的各兄弟民族给了全面的很大的支援和帮助，尤其是对藏族地区的改革，党采取了稳进、妥善、特殊的方针，对我们藏族人民爱如生命的自己的宗教和信教权利和自己民族的权力，从基本上给了完善的保护；因而，藏族各阶层人民头脑中的对其他民族的怀疑、猜忌、仇恨等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东西，不仅开始逐渐消除，而且对于在党和毛主席统一领导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民族摒弃力量大的压迫力量小的、先进的歧视落後的，而通过平等幸福的途径形成新的民族关系和新的民族团结，所有大小民族都非常欢乐等，藏族各阶层人民都有了程度不同的了解，所以爱国思想产生并发展了。同时，劳动人民逐渐觉醒了起来，有了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迫切要求从封建制度下解放自己，成为土地和社会的主人。当时藏族地区的大部分重要的封建活佛和头人，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关照下，他们中不少人思想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赞成拥护改革等，总的情况是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过去在未解放以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藏族地区向各阶层人民进行“共产党要消灭宗教和民族 " 等反动教育，制造了许多谣言；因此，各阶层人民的脑子里在怀疑：共产党会侵害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吧 !在个别地区，我们的干部对宗教和民族不仅态度不好，而且一个时期，在青海和甘孜的藏文报上公然无忌地刊载了很多关于我们藏族爱如生命的佛教和佛主释迦牟尼不对不好的粗暴荒谬的邪说，此其一；

在有些地区，在召开关于改革的会议和准备期间，就出现了改革後将会危害宗教和民族利益的迹象，此其二；

在改革方法上，上级讲时，是和平的方法，逐步进行、界限严密、保护对象等都十分明确，令人满意。但是一往下，就一级一级地转化为暴力的方法，贪快草率，界限模糊，保护不够等变化很大，使人民感到惊异，此其三；

在大部分藏族地区民改前说要收缴武器，因此，各阶层人民就认为：肯定要在民改中整我们，不然就根本没有预先收缴武器的必要，此其四；

其次，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发生了不少诸如此类的问题，给藏族各阶层人民制造了极大的惊慌和怀疑，致使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情况在向著不良的方向转化和发展。乘此机会，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扶持勾结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借口宗教和民族利益，喊出了“我们雪域上所有吃糌粑、念玛尼的人，要团结一致，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宗教和民族，争取独立＂的反动口号，并为发动以此相适应的叛乱而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以至在宗教和民族的旗号下，各阶层的许多人民受了骗，此其一；

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在藏族地区大力进行著发动叛乱的活动，此其二；

各地的封建活佛和头人内，一部分具有反动思想的人决心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并进行这样的努力，此其三；

诸如方才谈的四个和三个问题，由于敌我两方面造成的各种後果，在藏族地区燃起了无论是否具备反革命武装叛乱性质和条件的各式各样叛乱的火焰。因此，叛乱给藏族造成了诉说不尽的没有边际的灾难、损失和痛苦。藏族之所以遭到前所未闻的严重衰败，这同在藏 区进行平叛工作作的是否英明正确，有极大的关系。

第一、关于平叛

叛乱是具有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祖国、反人民的反革命性质，因此必须要平息，这是不言而喻的一大真理。平叛方式上，把党的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项政策，在执行中也要不予分割。关于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前面已在西藏问题中讲过了，不再重复。

在军事打击方面，除了必须铲除坏的，保护好的外；混淆好坏、乱打一气是极不应该的。因此在打击时要详细了解打击对象的情况，要了解这一点，首先要通过对各地发生叛乱的各自的主要的和局部的内因是什麼；共同和个别的外因是什麼；普遍和特殊的情况是什麼；统一和独特的特点是什麼。进行深入认真无误地调查，以明确区分发生叛乱的内外因、特点和情况，以求严格制止那种只听信诬蔑诽谤或荒谬的谣传，就算作发生叛乱的恶劣行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对由于怀疑或受惊或被骗而叛乱的人们，要以进行消除怀疑、安定人心、晓以实情的争取工作为主，对他们的少许坏行为要忍耐等待，对他们不到最後不进行军事打击。

对那些为了进行反革命而叛乱了的，由于其队伍中上了当和被强迫裹胁而加入叛伍的是多数，因此对这些人，也要在一定的条件下，积极地揭发叛乱头子的诡计，宣布叛乱的罪恶，消除其怀疑，晓以实情，而尽量争取，把瓦解叛伍内部的工作做到于心无悔，最後对那些仍然执迷不悟的股匪以军事严厉解决，以儆效尤。这样才是有根有据，不文不火，持之有理，人财少损，化难为易，感动他人，悦服人心，敌败我胜等，这样美好天成、恰当正确、圣洁的历史榜样的做法，就会成为千年万载称赞的对象。

但是在实际进行平叛时，在总的方面反革命叛乱是敌我矛盾，这是用不著说的，可是从藏族地区发生叛乱的实际情况来看，叛乱分子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二者都有，而我们的不少下级党政军负责人不懂得或不考虑这一点，并且认为那些敌人向我们进攻，这是战争，没工夫进行调查研究，而要立刻以战还战，加之军事就是要有被动争取主动，从而出现了不少先发制人的人。这一般说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具体从藏族地区实际存在的情况和发生叛乱的实际情况两个方面详细慎重地考虑一下的话，是不符合事实的，不完整的，不英明的。因为

(1)藏族地区的叛乱，大部分其初只不过是在各自的部落或家乡搞起骚乱，并没有向我们大的基地进攻。

(2)尤其那些叛乱分子没有军事前途，即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者，组织和装备极差，彼此没有援助和配合，内部矛盾多而分散，更重要的由于是反革命战争等，大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基础，在战略上是空的。所以那些叛乱分子要和以伟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战术武装起来的、在国内外多次大战中接连得到锻炼而且取得了许多伟大胜利的、装备现代化了的、声誉和光荣遍布全世界的、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作对，这只能是睁眼跳崖；对我们来说只不过象“蜜蜂想以翅膀扇击须弥山＂一样，我们根本没有采取紧急行动的一点必要 ;有把握有工夫去很好地调查研究叛乱的情况，而且必须要这样做。在战略和战术上对敌人的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要在战争之前进行，这连不懂军事的我也看的出来。

(3)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是毫无怀疑的铁一般的真理。但是一个时期在藏族地区凡是算作发生叛乱了的，很难说件件都完全具备了反革命叛乱的性质或条件。在这里边，就如我上面说的，由于我们的许多无意义的行为，使人受惊或怀疑或者由于上了反动派的当而起来叛乱的，是很多的，而由于那些人是受惊或怀疑或上当的人民群众，我们第一步必须以消除怀疑，安定人心，晓以实情而进行争取工作，做到无失无悔，而第一步就按敌我矛盾给以武力解决，我想这是根本不应该的。

(4)虽然实际上没有发生叛乱，而想镇压时，就诬赖诋毁地进行打击，此其一；把为佛教和人类的幸福而聚众念经的人们也算作反革命，进行镇压和打击，此其二；对“要叛乱了＂或者“已经叛乱了＂的没有根据的谣言不进行研究就相信了，而给以流血的镇压和打击，此其三；这三者更是荒谬绝伦极其拙劣的事情。

诸如此类，在藏族地区的平叛中，虽然发生不少，但是关于这方面中央也知道的很详细，今天卑职打算只是作上述的扼要汇报。如蒙垂询，容後详陈。总而言之，在藏族地区实际进行平叛时，由于没有完全执行把党的各项正确政策和各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英明正确的做法，因而造成了叛乱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立场顽固、叛乱到底等现象，不但伤害了很多人，而且农牧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使藏族陷于危险的境地，民族团结遭到很大的损害，

给国家造成了很大开支，制造了许多对党和国家的声誉在国内、国外、现在和将来都是不良不当等造成了许多无益而增添麻烦。

第二、关于专政

由于我们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要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进行专政，正确地分清敌我，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是党的主张和政策，是国家宪法的精神；因此对少数执迷不悟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和最反动的地主、牧主等危害革命有民愤的人，给以管制和关押等严惩不贷，以儆效尤，这是必要的。但是在大部分藏族地区由于负责人的关系，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完全执行。

广大的农牧乡村中，对积极分子自不用说，基本上说来，除去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余青壮年男子以及当地通情达理的人，在有些村庄的大部分、有些村庄的不少一批被草率地逮捕关押了，这是敌快亲愁的很不应该很不好的大事。叛乱後在藏族中被捕的详细人数，我们无法知道，但是从现象上来推测关押犯人的数字，每个地区都达到万把人或万人以上，因此如果说这些都是敌人，那麼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那麽要说被捕的人里边有敌人也有亲人，那就更是荒谬的了。不分好人坏人一律进行逮捕和关押，这就违反了世界上所有的公正法律，尤其由于我们是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这就严重地违背了这一原则。

因此不论从那一方面来考虑，在藏族地区掌管专政的负责人中，那些以贪图和勇于抓人的不明事理的干部，恣意玩弄各阶层无辜者的和平和自由生活，这对国内、国外、现在、将来都是根本不好的。对于那些没有好处而招惹麻烦的被关押了的千万个犯人的看管等，比我们西藏还差。特别是有意把那些犯人弄到水土不服的地方，千万人遭到了非正常死亡，造成犯人的尸体埋葬不完的现象。因此遭到非正常死亡者的几十万个父母、妻子、儿女和亲友，悲痛至极，泪如泉涌，嚎啕痛哭，遍及各地，这一情况，难以告人。

第三、关于民族权利

由于大部分藏族地区都发生过叛乱，因此我们的干部和军官中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喜欢藏族，恶意地歧视藏族，侵犯民族的特点，禁止风俗习惯等严重行为。例如基层干部说：“藏装浪费材料，不方便，是落後的服饰＂。而公开加以禁止，不让群众穿戴自己民族的服饰。并为了消灭民族服装和装饰品，利用政权，采取各种办法从群众手中收集装饰品等，尤其到後来，诸如对不少家户不分黑白没有根据地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等，做了很多违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各项法令的事。

在这些藏族地区虽蒙恩赐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适当地建立了自治州或自治县，但是由于干部的行径，藏族人民不但没有完全的得到党的政策和国家各项法令中规定的自治权力，并且由于大部分藏族地区发生了叛乱，在战争中损耗了许多人，此其一；

在平叛时期及其以後逮捕关押了许多人，使大批的人遭到了非正常的死亡，此其二；

一个时期，由于那里的群众生活非常贫困悲惨，以老幼为主的不少人被饿死或者由于体力非常衰弱，连小病也不能抵抗以至死亡，此其三；

由此致使现在藏族人口显著地严重减少了，不言而喻，这不但有害于我们藏族的繁荣，而且对藏族的存在有极大的危险，而陷入气息奄奄的境地。因此凡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当看到听到这种情况时，就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伤感，这是很自然的。

藏族地区的民族工作，平叛以来没有搞好。但是以後当党中央和慈爱的毛主席逐渐了解到藏族地区的这种情况时，就立即以很大的关怀给下级发出了迅速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指示；在下级对那些缺点错误进行补缺纠正和必要的处理，对工作进行改进和整顿等，由于这省委员会热忱负责和很好地努力工作，现在藏族地区的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已开始好转。但是州和县级党政干部头脑中的左倾盲动之风还没有平息，因而我想在那些地方的民族工作方面仍然没有表里一致、心口如一地执行党的政策吧

第十二个问题、关于宗教

在兄弟藏族地区宗教工作的情况，卑职在上面所述西藏的第七个问题里除去我们西藏特有的约百分之一的少许情况外，其余部分都和他们的情况完全一样，因而在这里不再汇报了。但是严重程度、时间长短以及规模大小则比西藏更坏了一大步。这一点从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实际存在的情况中是可以肯定的讲的。所以把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实际存在的情况加以综合时，可归纳成三点：

(1)无合乎标准的寺庙；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区寺庙和喇嘛数目比平叛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对于宗教知识分子和依教行事的“善僧＂予以铲除排斥，疯象般的打击，致使留有喇嘛的寺庙也形存实亡。由于把寺庙的主权授予了一些疯狼般地向和平、利他、圣洁的宗教进攻的脱离实际的人，因而使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变成了反对宗教的基地。在寺庙的任务方面：由于废弃了分内的宗教活动，而变成了“蹶腿＂的生产大队等 .所以虽有寺庙，但失去了寺庙存在的意义 .实际上是没有寺庙。

(2)无宗教的前途，在那些兄弟省的藏族地区，平叛後，在下级当政干部的直接间接的各种阻挠下，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的“讲辩著＂工作，连名字也听不到了；不要说宗教文化的存在，就连名字也眼看著消灭掉了等。在这些实际情况下，宗教的前途已实际被毁灭，因而事实上已没有宗教的前途。

(3)在那些兄弟省的藏族地区从基本上来说，僧俗人民群众无宗教生活，平叛後大部分地区，在基层干部的阻挠下，甚至连日常的经课也只能秘密地去念，如果干部看到嘴唇一动一动的时候，就会追问；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给以象对待反革命活动一样的压制，因而僧俗群众无法自由地过宗教生活，从基本上来说，事实上群众没有宗教生活。

从我在这里所谈的“三无＂情况等有关宗教方面的一些总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兄弟藏族地区平叛後，宗教工作方面由于极其严重的左倾行为，使藏族中除去小孩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惊讶透顶而失神，从而现在对藏人谈及佛教时，就不由自主地伤心落泪，并说：“我们地方被搞成黑地方了，我们死了就象死了狗一样＂等等痛苦之言，造成了利敌损己，没有好处而招惹了很大的麻烦。这些都是大大违背党的正确政策和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的行为，而且也是下级片面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表现。但是当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逐渐了解了这种情况以後，赐予了要对下级干部的这些缺点错误行为进行纠正和对工作要改进整顿的恩惠，因而使藏族地区的宗教工作有了少许改善。但这仅仅是开始改善的表现，还根本不够。